

新人=NEW MAN / 新人旬刊社 · 一V. 1, no. 1 (民国
37年[1948]7月) ~ [?] · 一上海: 编者[发行者],
民国37年[1948] ~ [?].

; 27cm

旬刊.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1, 原件藏北京
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
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2, no. 6

(1948. 7 ~ 11)

7
505
6.56.74

新 人 旬 刊

NEW MAN

Vol. I No. 1

期一第·卷一第

我們爲什麼要辦刊物

- 時 論 ·
- 愛國者的試金石·····戴杜衡
- 物價·美援與財產稅·····張嘉銓
- 專 論 ·
- 捷克政變的真相·····吳風人
- 中國文化之再生·····陳定閔
- 從近百年史的研究說到
- 中國民族文化之未來·····林一新
- 革新運動的起點·····李毓田
- 介 紹 ·
- 費邊社的主張及其活動·····相 晚
- 書 評 ·
- 「亞洲沒有和平」·····禾
- 通 訊 ·
- 神秘的西北角·····王文筆
- 編者言·····編 者

本刊直接訂戶訂費表 <small>郵費如有變動以訂費扣算</small>		新 人 旬 刊 第一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鄭 錫 鵬 編輯者 新人旬刊社編輯部 發行所 新人旬刊社 社址：上海（○）四川中路三三〇號三〇七室 電話：一八五八 全國各大書店本市各書報攤均有代售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上海浙江中路五三六號	
期數	訂 費		郵 費（平寄免費）
每 期	十萬元		掛號每期加一萬元
三個月	九十萬元		航空每期加三萬元
六個月	一百八十萬元	航掛每期加四萬元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每份全版中	版	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底封面	八千元	四千元	二千萬元	一千五百元
底封內	七千元	三千五百元	一千八百元	一千二百元
封 裏	七千元	三千五百元	一千八百元	一千二百元
內 頁	六千元	三千萬元	一千五百元	一千萬元

（一）本刊廣告一律單色
（二）贈書詳版請寄戶自備

行 發 一 社 新 人 旬 刊 新 海 上

號 日 十 月 七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國 京 圖 書 館 藏

我們爲什麼要辦刊物

在這裏，用不着一篇富麗堂皇的發刊詞來點綴這新生的刊物。更不應該以謊言做爲裝去欺騙讀者。

在這裏，我用純潔的良心和忠實的態度，說明我們爲什麼要辦刊物。大局是萬分的嚴重，沉壓着每一個人。有什麼話好說呢？大家都受着說話的困難呀！

時代是萬分的苦悶，窒息着每一個人，都想說話。爲了爭取言論自由，同時也因了言論自由，大家都在說話了。

一切在混亂中。「不許別人說話和說話不負責任」，這是混亂的大時代中的現象；至少在言論方面造成了這混亂的因果。

交響的表現，不僅是時局的反應，同時也推動了時局。一般的叫罵，是受了不安的時局的刺激；同時，叫罵也刺激不安的時局越發不安。這現象，將是一個時代末日的信號。

世界，人類，最小限度我們中國，就會沉淪下去麼？一幕可能的悲劇正在上演着呀！

大局這樣嚴重，時代這樣苦悶，是說話的時候了。面臨着沉淪的深淵，憧憬着上演的悲劇，爲了一綫的希望，爲了匹夫的责任，我們應該說話了！

「來不及了」，有人這樣慨嘆。我們就在能有的空間和時間說出應該說的話。

這刊物，是我們——「這我們是指全體性的呀」——說話的公開園地。我們憑良心，憑正義，憑理智，憑大公，說出應該說的話。

「人心思變」，「一切需要變」，已成爲普遍的呼聲。對於這個呼聲，有人特地加上一個保險，說「要變不要亂」，我們同意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但，一直到現在，變未成而亂已生，這才是悲劇中莫大的危機！所以我們一定要在「變而不亂」的原則下說話。爲了保證不亂的變，對於變的解釋必須正確，要有新的意義而不僅祇是「變換」，如像有人說過的「打倒你，我來。」那樣的變換。我們要提出新的觀念，啓發新的精神，倡導新的風氣，建立新的生活，創造新的事業——總結一句話：「以新代替舊」！

在大時代的震盪中，人們的神經逐漸由緊張而疲弱，聽覺需要調子唱得高，胃口需要刺激得够味，好像用嗎啡去成烟癮樣，一直到神經失掉作用爲止。這是世紀末人類的絕症！一副清涼劑，解不了時代的高燒病。

也有人這樣慨嘆。但是，爲了尊重醫學的常識，我們絕不投合病態的需要；我們信賴醫學的指示，誠實的說出違反病態需要的話。

事實和理智，是我們說話的根據；是與非，是我們說話的尺度。我們基於自由主義的精神，尊重自己的意見，說出自己所要說的話，同時也尊重別人的意見。我們不儘如時下所流行的站在兩個極端的中間，我們是站在真理和正義上面，我們站在世界，人類，最小限度我們中國，的全體立場上，爲其迫切的需要而努力，而說話。我們相信真理和正義與全體的需要是「一致」的，決不是任何「一邊」的事。憑了這個「一致」去克服多邊的矛盾和殘酷的鬥爭。最低限度，希望所有自由主義者，首先一致起來。我們就依據這些觀點來說話。

我們謹以善意和所有關心國家乃至世界問題的誠與不誠的朋友來互相探討——希望求得「一致」。這是可能的一致。因爲我們相信，就職業說無一論那一界，就地位說無論那一階層，就集團說無論那一黨派，凡是健全的事業，健全的全體，必須他的每個份子健全。我們提出「新人」這個號召。這是我們從大局看，從各個事業看，從各個團體看，「一切都在向壞的方向變」，在這中間，我們找出了「人」的因素。「事在人爲」，一切問題在「人」。所謂「人心思變」，應該給以新的解釋，第一要改變人心，首先改變自己成爲我們所號召的「新人」。有了新人再來改變一切的事物，然後才有新的前途。我們的刊物叫做「新人」，拿這個刊物作爲「新人運動」的旗幟。爲了歷史每個人都有做新人的權利，爲了時代每個人都有做新人的義務，爲了嚴重的大局每個人都有做新人的責任，爲了個人每個人都有做新人的必要，所以這一「新人運動」是歷史的使命，時代的任務，是屬於全體人人的。在一篇短短的說白當中，寫了很多的「我們」這兩個字，「這我們是指全體性的呀」，再一次的莊嚴的聲明。

至於，新人的理想是什麼呢？

自由主義的精神！

民主主義的政治！

社會主義的經濟！

大同主義的世界！

這已是一致的主張了。我們將向這些目標作廣大深入的宣傳和教育，並且進一步爲這一致的主張，作「團結」的努力。

最後，我們以最大的誠摯，熱情和希望，敬祝新人的誕生！

愛國者的試金石

——評反扶日運動

任何什麼事件，任何什麼問題，如果祇把它單獨的提出，當作一個孤立的事件，孤立的問題來考察，從這樣的考察所得的認識與評價，是難於十分正確，十分公平的。一件事之前往往有一連串的事件爲其先導，此一事件不過是那連串事件的一個發展；一問題四周也往往環繞着許多問題，與之互相牽涉，互相糾結，而成一整個的問題，此一問題不過是那整個問題的一個環節。我們必須從這種時間與空間的聯繫上去考察一切，纔能得其真相與本質。

在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的高潮中，我們常會聽到這樣的質詢：「你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嗎？」對這質詢，我們單純的回答一個「贊成」或「反對」，都不免太過天真。我們不要看得這質詢表面上是如此單純而輕率答覆。這已經成了一個運動，就不單純。我們必須追究提出這個質詢者是什麼人？在怎樣的時候提出？用怎樣的語氣來提出？怎樣的字眼來提出？提出這質詢是怎樣的動機？他所企圖達到的是怎樣的目的？然後答覆。

舉一個最極端但也最明顯的例來說明。你是否贊成世界各國都有自求生存，自求繁榮的權利？對這樣的問題，恐怕誰也不可能回答一個「不」字。

但是，如果提出的質詢是「你是否贊成東亞各國共存共榮？」提出的人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或其傀儡走狗，提出的時候是正當日本對我從事武裝侵略的緊急關頭，你如何呢？共存共榮不容反對，至少這方面不容你反對，但你能乾脆的，單純的答一個「是」字嗎？至低限度，我們得在這單純的「是」字之後加上一個但書，譬如，我們所要的是如何如何的共存共榮，或者，我們反對如何如何的共存共榮。這不是節外生枝，這是必要。

反扶日問題，最單純，也最複雜。作爲一個孤立的論點，它是單純的；作爲一連串事件的發展，作爲一整個問題的環節，它是複雜的。

美國有沒有扶植日本？美國已把日本扶植到如何程度？將來可能扶植到如何程度？扶植到如何程度是日本人民生存所必需，是可以允許的？扶植到如何程度就可以養成侵略力量，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這裏面包含了許多極專門的課題，非專家不能確切回答。而且專家們態度縱極客觀，所得結論我們敢預言其決不會一致。但是，在這些問題上，一個常人的觀感往往會比專家的結論更爲健全，極普通的常識也往往會比專門知識更爲有益。一個常人的觀感是：從鮑萊報告到斯揣克報告，從斯揣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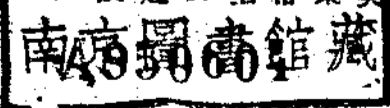


戴杜衡

告到強斯敦報告，一步進一步，雖然還沒有形成長期的政策與事實，動態是顯然而不可抹煞的。國要復興日本的工業。常識又告訴我們：平時工業與軍事工業之間，實在劃不出一條明確的界線。常識又告訴我們：以日本那種過剩人口的壓力，本土糧食原料的缺乏，以及特殊經濟環境所造成的特殊國民性，它要求向本土之外發展是一種極自然的趨勢。常識又告訴我們：日本如果向外發展，中國幾乎是一個必然的對象。因這種種，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而對眼前事態感到憂慮，有所警覺，乃是極自然的事。若必待專家們得到一致的客觀結論之後再來憂慮，再來警覺，很可能已經太遲。

反對扶日是應有的，縱然做得過火一點也是應有的。人家儘着往那一極端走，我們要盡力往這邊拖，纔能希望最後共同走上一條較爲合理的中間道路。犧牲必須過正，嫌彈簧太鬆必須壓得更緊於你所需要的程度，纔能抵消彈簧回來的力量。

因此，純粹站在愛國者的立場而從事反扶日運動者，我們對之祇有欽佩。但是，正如前面所說，這問題祇在孤立的提出時纔顯得如此單純；若放到時間與空間的聯繫中去考察，就變得複雜。因這原因，就另有一些人也同樣站在愛國者的立場，來批



評，來實難這個運動了。

這些責難者批評者所提出的正面理由，大都是不甚堅實的。他們有的根本不承認美國有扶植日本的意圖，有的承認了美國在扶植日本而不認這種扶植可能招致侵略勢力的復活，他們再三說「不致於一而不致保證」；他們縱有敢保證者而無法取信於人。但是他們口頭雖提不出理由而心裏終是不服氣，他們的不服氣倒不是全無理由。

在這裏，我們要看一看抗戰勝利以來中國所謂愛國運動是如何發展下來的。中美商約的訂立曾經引起了一度反對的運動，這些反對者對中蘇條約却並無一言非難，其中勇敢者甚至還把它贊美為中國真正安全的唯一保障。九龍城事件曾經引起了一度抗議的高潮，這些抗議者對北塔山事件却視若無睹，其中勇敢者甚至引經據典來說說蒙軍進出的地區的的確確不是中國的領土。香港澳門他們熱烈的要求收回，對旅順大連則在深慶其獲得解放。一些人反對美國駐軍，這倒也罷了，他們還反對對美國的援助，美國的救濟。凡此等等的事，不勝枚舉。

中美商約與中蘇條約二者那一個更喪失國家的主權，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該能够分辨出來；九龍城事件與北塔山事件何者更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也應該能够分辨出來。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如果反對中美商約，他必更憤慨的反對中蘇條約，如果他抗議九龍城事件，他必更熱烈的抗議北塔山事件。如其不然，則所謂愛國運動的動機就值得懷疑。

如果這次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的號召者，正是那些反對中美商約而贊美中蘇條約，抗議九龍城事件而無視於北塔山事件的那些人，這個運動之被視為「對有用者」，被視為一種「陰謀」，就不為無因。因為這運動並不是志在防止日本再起而是志

在反對美國；並不是從反扶日而引起反美，而是先要反美然後找到反扶日這個題目。

再看目前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一個真正愛國者應不難發現國家已受到遠較日本再起為嚴重的威脅。日本究竟已經戰敗，它的再起究竟還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縱使是必然，也還是將來而不是目前的。目前，一個受外國指使的國際武裝力量已經在我們領土的一角出沒了。對這個遠更嚴重的事實，我們的愛國運動者也照舊往時舊例，視若無睹，故意放開目前的，既然的不談，而特別強調那個未來的，或然的，其後果是一方面錯亂人們的視線，從而麻木了國人對那一個更大威脅的警覺，另一方面是傷害友邦的感情，從而削弱了國家抵抗當前威脅的力量。

我們不能說今日參加反扶日運動者都是如上所說那樣的動機，那樣的目的。我們不能這樣說，同時也不忍這樣說。有人指責此運動為「陰謀」，為「別有用心」，我們深願，這是一種譏刺，是一種毀謗。的確確有若干參加分子已證明了他愛國者的立場，加上了必要的但書，這些分子還是值得欽佩的。但另一些分子，而且是參與運動的大多數分子，都還沒有作適當的表白，以自別於另有作用者，却未免遺憾。

要對那些態度立場尚未分明的分子作一個測驗是容易的，這個測驗會像用試驗紙來試驗鹹性酸性同樣的簡單而確切。我們祇消問：你們為美國扶日問題而號召廣大的運動，你們對於中國從東北起一直到帕米爾為止的整個北部邊陲所受的威脅，以及在那裏進行的各種陰謀，是不是也有所警覺而願意有所表示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你們終不失為愛國者；如果對這問題閃避不答，就不能怪人們懷疑你們號召或參與反扶日運動的動機與目的了。

巴拿馬賽會特獎

眼科良藥

白敬宇眼藥

全國各地均售

天生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運銷寰球藥品

自製燕牌良藥

上海南京東路三三三號

分店：重慶·成都

物價 美援與財產稅

張嘉銓

物價，美援與財產稅，這是當前經濟上的三大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處理關係乎我國今後的經濟命運。處理妥善，可以扭轉當前險惡的局面，否則，經濟崩潰，國家便陷於長期間的混亂。

這一次物價漲風，延了一個多月之久，愈到後來，愈益嚴重，僅六月廿五日的一天，一般物價普漲三成，金鈔黑市超過四成，這種嚴重的情勢，使人意識到法幣已到了末日，經濟已面臨崩潰的前夕了。

戰事失利，政局動盪，都是造成「六·二五」狂潮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癥結還是通貨急劇膨脹的結果，本年三月間政府當局在國民大會報告，法幣發行額截至二月底止，尚不足七十萬億，六月中旬王雲五在立法院報告稱：「至五月底，法幣發行額達一百卅五萬億元，本月份之支出預計為七十五萬億，收入預計十五萬億。」從上面的統計看來，本年三、四、五三個月的通貨膨脹，等於十年來膨脹的總和，而六月份的膨脹，又等於三、四、五、三個月膨脹的總和。這種膨脹顯然是全國性的，可是通貨發出以後，又由各地流向上海，以是上海承受通貨膨脹的壓力較任何一地為大，物價的上漲也就起了領導的作用。

市政當局暨其他有關機關，為應付當前漲風，日來不斷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漲風已漸平息，但這是暫時的現象，欲長期穩定物價，非從收縮通貨穩定幣值着手不可。若干人主張以改革幣制來穩定幣值，此說似嫌過早，因為我們還沒有改革幣制的條件。經濟學家伍啓元對改革幣制的意見是：「不能不改，又不能改，」今天的情形的確如此。目前我們對於穩定物價有二個期望：一是善用美援，一是迅速開徵臨時財產稅。

美援不是恩惠，我們必需善加運用，既不能依賴也不可浪費。美國此次援華用意，是在協助我國走上經濟復興的途徑。美國的援外法案定期四年，第一年係屬試驗性質，如果運用妥善，我國還可以在未來的三年中繼續獲得是項美援，如果這次的美援運用失敗，不僅關閉了外援之門，而且錯過了復興經濟的時機，因此，我們必須高喊，美援的運用，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四億美援中，除了一億二千五百萬為軍事特別援助外，其餘二億七千五百萬如何運用，中美雙方尚在繼續洽商中，原定六千萬用於華南建設，三千萬元用於復興農村，這計劃可能因削減款額而有所變更。筆者認為最有效的使用，是把它作為財政

收支平衡上的工具，一百卅五萬億元法幣，如以目前黑市美鈔計算，約值四千萬美元，因此，我們如果有一億美援，使用於收縮通貨平衡預算，當能發揮相當的力量。假定我們在未來一年中，每月有二千萬美元專作收縮通貨平衡預算之用（二千萬美元合法幣六十餘億），則本年六月份以後，可不必再發新通貨，再以其方法，從事開源節流，則幣值與物價自可日趨穩定。

有錢出錢，我們始終擁護這一原則，國家經濟會弄得如此嚴重的局面，就是政府始終沒有決心來向豪門開刀的錯誤，今天是戰事進入最緊張的階段，而經濟又到了最嚴重的時期，不向豪門開刀向誰下手？對立法院主張開徵財產稅我們完全贊同，並希望迅速推行。

通貨膨脹，是政府剝削中下等階級的購買力，既不公平，又為害最大，政府為什麼不及早放棄這一政策，而竟坐視豪富為非作惡？

當前工商界處境的困難，我們深表同情，因此，對於擬議中的財產稅，必須重徵豪門，輕課工商業，惟有如此，方不失開徵財產稅的意義，也唯有如此，對今後的經濟才有補益。

（六月二十八日）

捷 克 政 變 的 真 相

· 吳 風 人 ·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歐，毀滅了奧匈帝國。捷克(Czech)與斯洛伐克(Slovak)等民族，由之得到解放，並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Czechoslovakian Republic)。——後簡稱「捷克」。當日解放鬥爭的下層主力，是受德、奧資本家榨取的捷克產業工人；而領導解放鬥爭的人，却是捷克的民族主義者馬沙里克(Thomas G. Masaryk)和貝尼斯(Benes)。經馬沙里克及其所領導之「民族社會主義黨」(National Socialist Party)的努力和英法的協助，捷克政府才得成立。協約國當局之所以容許捷克國家的形成，如莫瓦特(R.B. Mowat)在他的「現代歐洲外交史」中所說，是為着恐怕中歐的巴爾幹化。

這一新生的共和國先天地潛伏着兩大問題：第一，產業工人的力量，由於高度工業化之故，較為強大，時可威脅捷克的統治階級；第二，內在民族的複雜——有德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卡巴特·烏克蘭人(Carpatho-Ukrainian)斯洛伐克人等。他們時常為自己的獨立的鬥爭，反對支配政權的捷克人。關於後者，有一特點：即文化進步的德國人在其民族鬥爭之中復帶着濃厚階級衝突，即工人信奉社會主義，資本家服膺大日耳曼民族主義；其他各民族，由於經濟的落後，並無資本家與產業工人的參加。

為着上述的原因，新生的捷克，適應十月革命的浪潮，出現強大的捷克共產黨。牠的強大正是捷克工人多對馬沙里克政府失望的指針。依馬沙里克的理論，捷克等民族，該當滿足新政體的建立，與慶賀奧匈帝國鐵鍊的解除，可是，捷克的工人却要超越民族問題的籬籬。於是，新生的共和國若續若斷地發生階級衝突。一直至一九二六年，捷克的資本家才宣告自己的勝利；至於捷克共產黨則陷於瓦解的慘況中。

但是勝利的捷克統治者無法避免經濟的危機。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給新生國家的打擊很大。到希特勒登台時，牠就發展為國家的災難。因為在經濟危機的鞭打下，捷克重新掀翻舊的傷疤，即所謂階級衝突與民族鬥爭。雖然，捷克的工人，已被資本家壓服，但蘇台德區(Sudeten)的德國工人，却受納粹的影響。(他們本來是集中於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組織中。當不景氣時，他們越境入德工作。德國擴軍，需要他們工作。他們得到的實際工資，也大過捷克。這一經濟條件使蘇台德區的德國工人，轉而信奉希特勒主義。)在一九三七年投票時，該區的德國人，投贊倫(Henlein)——蘇台德區納粹的首領——票的，達百分之五十。

捷克政府無法消弭國內德國民族的離心運動，只好等待一九三八年的

末日審判(即所謂「慕尼黑協定」)。捷克的工人在那嚴重時日，也不能有所作為。因為捷克共產黨(後簡稱捷共)正奉行莫斯科當時的向右政策，而從事「人民戰線」的運動，並以全力要求「英、法、捷、蘇的軍事同盟」。在希特勒威脅中的捷克小資產階級，多加入捷共，而捷共由於政策向右之故，也變為狂熱的民族主義黨。誰如不健忘，誰應記得當慕尼黑危機時，捷共的領袖即這次政變的主角高德華(Clement Gottwald)，曾與捷克的法西斯首領蓋達(Gajda)將軍一度合作。

為着國內的這些分裂，捷克的資本家，就把全部希望寄託於英、法。但在張伯倫執政下的英國，在慕尼黑會議中，却把她出賣給希特勒。這種絕望的形勢，使捷共崩潰——只有中央機關報繼續非法地出版，它的主編人却是一個曾被第三國際指斥為賣國賊之季諾維夫的信仰者，與反史大林主義的學生。至於社會民主黨的刊物，完全停刊；原由貝尼斯所領導的民族社會主義黨的思想，今則迅速地法西斯化。到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佔領布希米亞(Bohemia)與摩拉維亞(Moravia)後，捷克的羣衆更陷於消極。接着，由於希特勒軍事上的勝利，他們領袖的突然隱匿，軍需工業景氣帶來之物價生活的比較改善，和德國特務人員的恐怖，捷克工人就完全失去反

執心。

至於對付斯洛伐克人，聰明的希特勒，用「獨立」收買她。當地的農民在曼爾戰爭期間，過着平靜的生活，並爲着解除捷克資本家的剝削，而感謝希特勒。農民的政黨，就是哈林卡(Hilinka)的教士法西斯黨。納粹利用他們的感激情緒，設法使她工業化，把它充當後日侵略烏克蘭及匈牙利、巴爾幹的基地。

一九四一年，德國攻蘇，大局轉變，捷克軍衆所潛伏反抗納粹的情緒，只受些微的激動。這由於摩拉維亞與布希米亞是希特勒的大兵工廠，防守極嚴；和納粹的特務，用焚毀村落的野蠻手段，威嚇農民。儘管工人心裏不服，並對反納粹的人員表示同情，也不能有大規模的行動。由之，在納粹崩潰前，捷克沒有似南斯拉夫及法國那樣的大規模反德運動。

這種情況，繼續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死亡止。但摩拉維亞與布希米亞兩個「保護國」，是最後解放的區域。就在當年五月五日發生暴動時，蘇軍在一百四十公里之外，美軍也相距四十公里。馳名的「布拉圭(Praha)暴動」，至今還未明白其實情。就整個情況而言，由於缺乏武器和嚴密的組織，在解除德國統治後，參加的軍衆並無作爲。因此，讓運來的蘇軍，收取成果。這被自稱爲「解放者」的軍隊，進入布拉圭後，一切行爲很難

捷使克人民相信那是「解放者」。但捷共在武力支持之下，迅速地增強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我們要說到解放後的捷克經濟情況：當慕尼黑會議前，大產業多屬於猶太人及國外的資本家，到希特勒佔領捷克，他就被德國的托拉斯所合併；少數捷克人的小工廠之所以能够倖存，也祇是因爲這些工廠主表示願與希特勒合作。因此，一旦希特勒的勢力失墜，德國的產業與捷克的資本家，均被暴動者消滅。這也就是說，復活的捷克在事實上並無資本家階級。所有銀行，工廠等，在「臨時政府」搬回布拉圭前，並無主人。

在暴動中長大的捷克工人，却成立「工人會議」，「民族委員會」，和「工人糾察隊」，奪取各地的政權。又當希特勒統治時成立的統一工會，此時也受前此幹部的領導，改稱爲「革命工聯會」，過去，工人因民族而分化的情勢，經過希特勒的統治後，例反聯合起來。這算是解放後捷克的重大收穫。

所謂「臨時政府」，在貝尼斯領導下的政府（牠是由俄國還回的），名義上是六個政黨所組織之「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戰綫」的政權。這六個政黨，內有四個是捷克人（捷共、社會黨、民族社會主義黨、及人民基督教黨——如果捷共是最左的，那人民基督教黨便是最右的），兩

個是斯洛伐克人（共產黨、民主人民黨——他們的主要幹部，都是以前哈林卡的教士法西斯黨人）的。但實力最大的，要算共產黨。因此，貝尼斯的政府之存在，是靠共產黨的擁護。共產黨是否擁護她，那又決定於蘇聯對於貝尼斯們的信任。

臨時政府的工作：第一，是遣回少數民族。計有三百萬的德國人，少數的匈牙利人，被驅逐離境。這一段是殘酷的，表面上信奉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捷克工人，却是那殘酷手段的歌頌者。若干觀察家，認爲這是數年來反動民族主義深入工人腦中的結果。

第二，是產業國有化。首先提出牠的，是社會民主黨，後來得共產黨與臨時政府的同意。事實上，那只是承認現狀，因爲捷克的工廠，早無主人。可免國有化的，是雇傭一百二十個工人以下的捷克人工廠，和被認爲「良好愛國主義的所有主」的財產。由之，「國有化」事實上是不流血的，不危害還存在之捷克資本家的動作。問題在此：這一國有化究竟會發生何等的效果？早在希特勒統治時，捷克的工業，已受各種計劃機關的支配，解放後，那些機關並不取消，且因國有化而擴大。機關的擴大，就等於說官吏的增多。依官場統計，一九四七年九月間捷克的官吏，比一九三八年多十三萬至二十萬人，而捷克的人

口，却因遣走少數民族減少了百分之二十。「會計與統制」(Vatnostroitel'skaya Kniha) 什話，估計全國的收入，有百分之四十八花於政費；而牠，還未包括國有化產業內的官吏。又在這大批官吏中，高官及工廠的經理所得多，而下級的生活則十分清苦。

第三，是農業問題。德國人的土地，被以前的政治犯，前捷克的兵士，抵抗的戰鬥員等瓜分。有許多工人，趁機掠奪德國的土地與財產，道德上十分墮落。大地產被細分後，過去高度機械化的捷克農業，完全更改牠的面目。不僅如此。由於德籍熟練工人及技術工人的被逐，捷克農業技術開始衰落，而且感覺人手不足。政府又奉蘇聯的指示，在捷德邊境，建立軍事，任土地荒廢。所預定由羅馬尼亞、布加利亞移來的農民，不能代替德人，因爲他們的知識太落後。政府移植這批人的真正用意，恐怕是減低生活水準，威脅城市的工人。

第四，是收縮通貨。希特勒政權亡後，捷克通行的德國馬克及保護國克郎(Gesetz)等大爲膨脹。臨時政府決定凍結銀行存款，發行新幣——每人不過五百克郎，並提高物價及工資爲一九三八年價格百分之三百。但是，各地的物價，多超過那限額，因此，工人的生活比一九三八年低。當日受益的，是手中擁有實物的商人，受打擊的是薪俸生活者。

由上述的設施，使我們明白解放後捷克各階級的生活。這個被納粹選為重工業區的國家，如有合理的設施，及得到真正的獨立，那麼人民的生計，就易於改善。但國際的情況，却不許她。因此，在捷共佔優勢下，捷克人民感受兩個痛苦：第一，官僚的專權，使國家巨量財富，使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削低；第二，蘇聯的榨取物資，使國力困乏。茲先說前者。

依「新經濟」(Nove Hospodařství)的報導，經工會聯合會總部的估計，每月每人的生活費已增至二千九百克郎，內中還不包含房屋的修繕費。工人的收入，包括社會安全等等，都在最低生活費之下。屬於這類收入的人，有在紡織、衣服、玻璃、陶器、紙、羊毛、糧食各工業工作的工人，和官吏中最低兩級。至於農業工人、園工、森林工人、在服飾業等部門工作的工人，平均收入只有一千七百克郎，也就是比生活必需的工資低百分之六十。但是高級官吏，及國有工業管理人的收入，却為不熟練工人之十倍，十五倍乃至二十倍。普通工廠經理每月收入為四萬克郎，另供給別墅，汽車等。由於官吏收入太大，所以國家預算中的行政費，佔一巨額。依同刊物的報告，預算中官吏的交還費為七八〇萬克郎，汽車(非貨車)維持費為一八〇萬克郎。去年，曾因工人的不滿，各報紙時有攻

擊官僚的文字。捷共利用牠，開始肅清官僚。事實上，是排除異己，以自衛的同志替代。我們應知道一點，捷共本身就是新官僚的供給者。

我們再說蘇聯對於捷克的榨取。當蘇軍開抵布拉格時，捷人熱烈地歡迎他們，坦克堆滿鮮花，剩留的人民食物也提供軍糧。捷克工人受紅旗的刺激，回憶舊日革命的情緒，但接着蘇軍的暴行，便使人瞠目不解。這些不解者，目擊蘇軍拆除工廠，說那是他們的戰利品。另又獨佔約亞契姆斯塔流域(Joachimsthal Valley)鈾礦的管理，因為那是原子彈的原料。此外，蘇捷貿易協定，許蘇聯享受「最惠國」的待遇。依牠，捷克貨物要首先輸蘇，而蘇聯却把牠轉運美、英、法，取必要物資，捷克所得到的，只是盧布的信用。就一九四六年而言，捷克對蘇的出超達七萬克郎，牠並無償還。至於蘇方給與捷克的，多為匈牙利等給蘇的賠償品，而非蘇貨。由於上述的事實，捷克目前成為蘇方的無價生產者。捷克人民，要為蘇聯義務地生產物資。

這是否說，捷克人民能够公開反蘇呢？答案是否定的。經過「革命工聯會」的作用，捷共控制了工人。工聯會在工廠中，設有「工廠委員會」。該會的委員，不是由工人直接選舉，而是先由各黨按一定比例，決定候選名單，再由工人選出。為着捷克工

人的文化水平頗高，工人大半不投名單上候選人的票，使每工會的選舉，不能達到必需選票的三分之二。捷共針對這一現象，自一九四七年春天起，不管工人選舉與否，由中央工聯會指派人員。這些被派者，在工廠中不工作而有較高的收入，負有監督生產及工人活動的任務。他們事實上，就是特務人員。在他們監視之下，工人無法作公開的反抗。

但是，貝尼斯們却不能和工人或一般人民一樣，沈默不言。他們知道：捷共之所以有力，在於掌握內務部，和有蘇聯的後盾。他們又以為，如果捷克能够接近美方，就可免蘇聯的支配。也許為着這兩個原因，當「馬歇爾計劃」宣佈時，貝尼斯主張接受邀請參加巴黎會議。可是，貝尼斯的接受，經蘇聯政府宣佈為「不友誼行動」後，馬上取消。

情勢發展到這地步，捷克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莫斯科既不能允許捷克投入「西方集團」，就訓令捷共處理貝尼斯們。於是以前內長諾賽克(Nozik)為導火線，高德華表示辭職，內閣總理職。這些的威脅，使貝尼斯屈服，政權遂由六黨聯合，變為社會民主黨與捷共的聯合政府——就議會席數而言，兩黨議員佔三百席之一五。受捷共指揮的警察，開始拘捕，監視異己，封閉異黨黨部。經不起這次改變的打擊，外長小馬沙里克(

保捷克建國元勳馬沙里克之子)自殺，被拘囚的貝尼斯，最後也讓總統位給高德華。

目前，捷克事實上已成蘇聯的保護國。在十二年來，遭遇兩次大變(由希特勒的佔領，到高德華的改變)的捷克人，其處境之悲慘，是難於形容的。儘管在改變後的投票中，有七十七萬餘的捷人投空白票或夾着馬沙里克的相片，而這心理的抗議，對實際並無補益。

許我們如此說：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的捷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名存實亡。她目前成為蘇聯與西方集團鬥爭的基地。過去，希特勒把她作為後方的兵工廠，現在，史太林使她充當前綫的兵工廠。她在這二十年中只更換了統治者，並沒有享受真正的獨立。全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被侵略與被壓迫民族，都不能不對捷克人民表示同情心；因為，那是他們的鏡子啊！(六月十八日寫於上海)

編輯部啟事

- 一、本刊「時論」、「專論」、「介紹」，「書評」，「通訊」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請以三千字為限，至長不得超過六千字。但特佳者，可長至萬字。
- 二、作者請署真姓名，其顯署者名者，亦請以真姓名署名。本刊各文責實，由作者自負。
- 三、本刊稿費暫定千字二百元，拾萬元至二百萬元，於稿件排印時寄發。
- 四、來稿請寄上海(○)四川中路三三〇號三樓三〇七室本刊編輯部收。

中國·文化·的·再生

陳定閔

我在去年年底，曾經被邀參加一個招待邊疆民族的茶會，看到那些和我們生活方式迥異的邊民，其體格之魁梧，生活情趣之豐富，舞蹈音樂之樸實而富於活力，深受感動；再環視一下我們自命為中國民族的領導者的內地人，頗有相形見絀之態，覺得我們是太大了，我們太消沉了。我於是追求什麼因素使我們如此的。回來之後，便寫了一篇中國文化的危機。（請參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中央日報的社會研究第三十二期。）那時我的興趣集中在中國文化史的探討，當時我對於中國文化的看法，是以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總成績，也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總表現。從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形式即可以觀察出一個民族的活力，一個民族努力的成就，以及其前途的命運。我認為中國內地人民之衰老消沉，全由於其文化之衰老消沉所致，從中國文化來看，我們的活力已經到了年老力衰的境界。證諸史實，我以為中國文化，每一次開出燦爛的花朵，全由於經過一番相當長時期的文化大融合；而中國今日的文化，走到這個局面，幾乎毫無生力，我們沒有新的宗教精神，喪失文化中音樂，彫刻，建築，舞蹈等代表民族精神的主要成分，我們沒有自成新體系的哲學系統，也沒有新興的技術與科學，一切制度殆已半僵化，成為行爲的贅疣，表現中國文化是醜惡，污穢，輕巧，浮躁中國文化像一朵開足的花，滿次衰頹凋謝。我會經主張要復興中國文化，只有再來一次大的融合，而所謂大融合，不只是向西方學習，而是要能吸收邊疆文化，尤其要吸收邊疆文化的精華。我會經這樣說過：「告訴你，我們的文化已經沒有任何地方值得誇耀的，只有再來一次大的融合，再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否則只有一任其凋謝下去。所以我們今天是需要新的精神，中國文化需要新的血液。……我們需要大大的文化融合，大大的文化交流，更需要大大的再造。中國文化正在黑夜中摸索不定，只有這一條路

才是光明的出路。」

這篇文章寫成以後，意猶未盡，總想有一個機會把自己所想到的再補寫出來。後來，看到大公報上顧一樵氏所發表的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文，雖然我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要求中國的文化之再生則一。所以我那些未盡之意，更想找個更深刻的理論根據，以說明此一問題的解決的途徑。

中國文化需要新精神，新血液，而此新精神或新血液之來源是融合若干文化而形成的，所以我們要求中國文化再來一次大大的融合。問題是在中國有沒有融合若干文化的可能性，再進一步說，中國文化是不是可以輸入一點新精神或新血液。如果是可能的，那末中國文化即可能再生，即可能有進步，反之，中國文化只有滅亡，只有退步。半年來我追求中國文化發展的障礙到底是什麼。探索到底是什麼因素使我們無法融合，使我們無法接受新精神或灌輸新血液。我以為中國的傳統思想要負這個責任。中國思想史裏缺少一個最重要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是使西洋文化在近四五百年來突飛猛進的。這個概念即進步的概念。中國思想裏不是絕對沒有進步的概念，法家的思想即蘊藏若干進步的概念。中國的社會從春秋時封建制度的崩潰，演變到戰國時代，已經不是原始社會（Primary Group）的禮治可以控制的；社會變了，控制社會行爲的方法也得變，於是要求新制度的法家產生了。子產作刑書，儘管有晉國的叔向的譏笑，已抵擋不住他的新要求和新改革。韓非的五蠹，則更從人類演變的跡象立論，以為人類是進步的，他的進步的概念最堅定，所以他主張「聖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在他的看法，「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時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就是他的歷史進化論。但是這一類含有進步概念的思想在秦以後，就碰了一個大釘子，從此為中國的

正統的儒家的思想所排斥。儒家的思想是反進步的，他們雖也看到變，如孔子所謂「逝者如斯夫，不捨晷夜」，但是他沒有看到變得好，而只是變來變去還說不了那圈子。孔子的理想社會還是西周封建社會的制度型式，「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便是這種說法。他看着封建制度的崩潰，提出正名的方法以求恢復原有秩序。社會的情勢變了，他的理想制度似乎並沒有變。孟子是自命繼承孔子道統的人，所以他理想的制度也是復古的，他主張法先王，以為在先王所立的制度是盡善盡美，可為萬世的楷模。結果他的歷史演變論只有「一治一亂」永久在循環不已，中國二千年來的思想，就受了這一治一亂的循環不已的思想所支配，所以變來變去，總逃不開這個圈子，總無法進步。荀子是主張法後王的，但仍是復古的，「夫是之謂復古，是古者之治也。」所以他反對變，他以為主張古今異情的人是「妄人」(荀子，非相篇)。這種古今不變的思想，遂形成中國思想的主流。中國人的行為就受了這種主流所支配，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國社會的演變，往往為這個主流所阻滯不進。王安石的改革，遭受司馬光一流人站在傳統的精神上予以嚴重的打擊。清末士大夫所主張的變法維新，始終為一般人所反對，即提倡維新的有識之士，也不肯根本變更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精神。倡變法最早的馮桂芬，在咸豐十年寫了四十卷校邇廬抗議，自以為「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以屬以夷說」，但他終要掛一個尾巴，「而要以於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是此種意識形態所造成的，他的勸學篇中「內篇務本」，也就是說明中國的傳統變不得，他儘管要求新的文化，但不是新文化的精神，這也難怪康有為談變法，一定要抬出「孔子改制」以為其理論的立足。所以我們的文化始終無法接受新精神，也無法注入新血液。

中國傳統的思想——儒家的思想，是阻礙文化發展，社會進步的，那末為什麼漢唐的文化開出燦爛的花朵時，正是中國傳統思想發達時？儒家到了董仲舒，成了正統，為什麼漢的文化又特盛？此可以有幾個解釋。第一，儒家的思想，在漢初並沒有成為思想的主流。秦是法家的天下，漢初因襲秦制，同時因為封君不希望統一，支配漢代初年六七十年的政治思想是道家的無為之治，到了漢武帝才真正的提倡儒術，儒生也才真正加入到政治舞台之上，然而到漢宣帝，儒生又開始沒落，他的政策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儒家雖不斷的要求改制，實際上是復古，是找出路，所以結果演變出王莽改制的一個悲劇。況且董仲舒以後的儒者，都把陰陽家的思想滲入

孔孟，算不上真正儒統；同時真正在支配政策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董錯是法家，桑弘羊是法家。儒家成為粉飾統治者的幌子，法家的精神反是真正統治的手段，所以雖有董仲舒以後儒家思想的特盛，而實際上，他只是替統治階級的政權給以合理的說明，並沒有能支配著中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接觸，交流。東漢的相譚，王符，崔實，荀悅諸人，已經沒有孔子那種「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的烏托邦主義的精神了，他們變得悲觀，「不復堅持聖賢相，歸仁化義之崇高理想，而欲以任刑參罰之術為補救治標之方。」到了仲長統，已經懷疑到儒家治術的崇高性。是儒家思想本身看來，已經撐不住氣要變。仲長統的悲觀，循環的退化論，正是他的意識形態的苦悶的象徵。這是說，漢代文化的發展，儒家所支配的力量不太大，尤其是各民族文化融合，儒家思想似乎並沒有力量反對過。第二，中國文化在秦以前，還是所謂諸夏的時代，自身尚未成熟，到了漢才漸漸融合調和而為一種文化的主型，所以在漢代，尤其是西漢，尚無一種優越的歷史傳統觀念，以為自己的文化是高於一切，所以他們能吸收新文化，融合新文化。

唐代文化所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力量更比不上漢，自命為「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傳道統的韓愈，除了他的古文復古，和那一篇衛道的「諫迎佛骨表」，和「原道」的文章對於中外文化的接觸與交流的洪流，始終無力抗拒。柳宗元也是同一命運。唐代正統的儒家思想，似乎一直沒有出過什麼大風頭。其次李唐本是胡漢混雜的王朝，他們的觀念已經蘊伏著一種不分夷狄華夏的綜合的觀念，唐代的天可汗更是這種文化融合的基本的精神。

漢唐儘管有正統的儒家思想，但唐不如漢，而漢儒思想對於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所支配的力量不太大，且漢儒思想裏只有天人之際，復古改制，沒有想到衛道以抗拒新文化之流入。唐儒本是勢力孤單，即雖要衛道以抗拒新文化，新精神，也是力不從心。同時，漢代沒有自命為優越的文化傳統，而唐則本身是文化採雜的產物，所以漢唐的文化能開出燦爛花朵，儒家的思想並不能阻滯之。到了宋明以後則不然，儒家思想衛道的精神特別濃厚，傳統的力量特別重大，宋理學家雖然無形中融合了儒佛的思想，但儒家思想的傳統是其主要的精神，他們對於現實問題，多零碎陳腐，所提供的遠大都是復古(當然也有同情王安石變法的論調)，而其他的儒家如司馬光三蘇之流則更是衛道的中堅分子。明以後，儒家思想更是根深蒂固，牠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也成為支配中外文化接觸與交流的支配者。這個主流成為我們文化無法再融合的一大障礙。言改革者如康梁，如張季(鴻章)，無不以傳統的文化為主，無不以傳統的文化

精神爲體，對於一切不同民族的文化，一方面是在不合道統的精神之下排斥，一方面是在不如中國傳統文化優越的觀念之下被割愛，中國雖仿製了槍砲輪船，也無法接受新精神，當然也無那種氣魄來融合不同文化爲一體，而創造一種新文化。革命思想濃厚的革命家，他雖然有着激進的思想，却放棄不了傳統的觀念，他在原學一文中，極力主張學泰西富強之術以救中國貧弱。他以為中國文化自孔子保民開，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文運收長，不會爲外族毀滅。中國一切學術和其他的非物質文化如哲學，道德，音樂，歷史，社會，文藝，醫藥等均我所長，無待外求。我們不應該醉心西化，這是不待人之摧殘而先自棄其風俗歷史。他的看法，民族之具有特殊優美文化者，應各自保存，勿使淪沒。雖然因爲時間的不同，不無旁採他族之處，但絕對不可全部改變的這種看法，是代表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看法，也是代表傳統思想者的看法。就是這種思想的首領而深入於民間，中國文化難以再有新的融合，難以吸收新的精神。

因之，我們的看法是：要中國文化再來一次新融合，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新精神，必先清除這種思想觀念上的障礙，換言之，我們的思想中要先培植「進步」的觀念，打破傳統的思想。培植「進步」的觀念，和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是一件事的兩面。我們只要放棄道統的看法，也就不會以爲先聖王的制法是完美，是絕對的了，因之，我們也不會以爲祖宗是比我們好，而一代不如一代了。「進步」的觀念自然可以培植起來。

中國思想史裏缺乏進步的觀念，西洋思想史中進步的觀念，實際上也是近代才興起的。希伯來人是不知進步的，聖經中沒有進步的字，就是希臘羅馬的思想，除掉循環不已的看法而外，進步也似乎與思想無緣。一直到海外的發見，十字軍東征以後，歐洲人的眼界大開，西洋進步的觀念，才慢慢的孕育起來。歐洲人和其他的民族接觸以後，尤其是和回教徒的接觸以後，把中古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毀了；文藝復興以後，科學發達，把人類的生活與思想充滿了希望；海外的大發見，使西洋人比較若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於是從十五世紀開始，西洋思想史中，進步的觀念勃興起來。科學家孟泰哥(Montaigne)，培根(Bacon)，笛卡兒(Descartes)，是進步觀念的先鋒。近代第一有系統的進步理念的是十七世紀的馮德乃(Fontenelle 1657—1757)，其後如皮老德(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韋果(Gian Battista Vico, 1668—1744)、屠果(Turgot, 1727—1781)、孔德索(Condorcet, 1748—1794)、高德文(William Godwin, 1753—1836)，都是進步概念的標母，甚至如康德

(Kant)，黑格兒(Hegel)，海爾德(Herder)，也無不對人類前途抱着一種進步的看法。到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這種進步的思想，在進化論恩澤所披之下，更是家喻戶曉，爲人所稔悉。西洋思想裏，就因爲近代不斷有進步的觀念在激勵，西洋文化，也因之而不斷的在進展，進步的思想又因之更不斷的在激澎湃，西洋文化，遂成了一日千里之勢。我們比較中西「進步」觀念之發生與有無，其重要的關聯，端在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的一個階段中。這個時期中西洋是與海外接觸的肇端，所以他們能打破中古傳統的束縛。我們在這個時期前也正是與其他民族接觸的時期，蒙古人的西方發展，鄭和的南洋的遊歷，都在這個時期之前。但爲什麼別人因接觸而有進步概念的發生，我們何以沒有？我以為專制政治和經濟制度要負這種責任。蒙古人統治中國，專制政治到了極端的階段，在漢唐時，君臣可以坐在一起談話的，到了宋，爲臣的須站着，蒙古人統治以後，君臣平等的精神沒有了，臣須向君跪奏，明清以後臣更是奴才化，專制政治日趨極端，使中國的思想孕育不出一種新的概念，而況前有蒙古人的統治，後有滿洲人的統治，在異族的殺戮之下，中國的思想只有崇尚道統了。蒙古人征服了南宋，但並未征服南宋的大地主，反之，南宋的大地主是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大功臣，所以中國的土地制度到元以後，不再有過大的改革，只在地稅上打主意，沒有在主的關係上求過改革，明清以後，其情形尤劣。西洋十五六世紀的經濟發展，打破中古的束縛，使神權變爲君權，使君權變爲民權，而我們一方面有一把銳不可抗的專制政治扼殺着中國人的思想，一方面又是一把不合理經濟制度在窒息着中國人的思想。別人的思想改變了，我們卻無法變；別人接受新的文化，新的精神，而我們只有抱殘守缺，株守着道統，以不變應萬變。所以別人進步，愈跑愈快；而我們只有沒落，愈陷愈深。中國的文化於是凋殘枯萎了。

中國的文化需要再生，其再生之道，要每一個中國人先改變求進步，求改革的觀念與思想，而此種思想觀念之孕育，端在先賢棄儒家思想的傳統精神。要屏棄儒家思想的傳統精神，尤須先擺脫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合理的窒息與扼殺。中國人才有接受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化精神的氣魄和能力，才能再有一次文化的大融合，中國文化之再生方可拭目而待。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已經有這種求進步的趨勢，雖然二三十年來，仍不斷的有着保守的勢力在掙扎抗拒，我相信，這種抗拒和掙扎只是迴光返照而已。新時代，新精神的來臨是隨時在等待我們，但看我們有沒有勇氣追求牠，接受牠。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於國立中央大學

從近百年史的研究說到中國民族文化之未來

林一新

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是一部受盡痛苦的歷史，內則連年戰爭，社會破產，外則受其他國家的欺凌，並且這二者又交相發生作用，遂使中國陷於極悲慘的境地。我們因為過慣了這種社會痛苦，反有時不覺得牠是反常的現象。但是如果將牠和其他發達的國家相比較，則吾人立刻感覺牠是一種非常慘酷的調查；即使將牠和我們本國以前的昇平時代相比，也有這同樣的感覺。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曾說到人類歷史發展：第一次常是喜劇，第二次則為悲劇；但是我們中國近百年來，第一次演演的却是悲劇，而且是最大的悲劇。

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是否將有喜劇接着悲劇而出現呢？正是這樣。我們的行程是第一次為悲劇，最大的悲劇；但第二次却是喜劇，最大的喜劇。事實上也是如此。這是我們東方人的精神。孟子在論做人方法的時候，曾這樣說過：「天欲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即是說，先有悲劇，然後才有喜劇；所謂受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所謂悲劇就是吾人受命運的支配，正確點說，受歷史命運之支配。不管是命運，還是歷史的命運，他都是表明一種客觀而獨立的法則，非吾人所能轉移的。但是我們人類和其他自然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如果一旦理解了這種客觀而獨立的法則，吾人便能起來轉移這個法則並為歷史的主人；在這個時候，喜劇便到來了。這個喜劇是極嚴肅的，而含有悲苦味道的，和那一般所謂天真的喜劇，僅一憑已意的喜劇，是不相同的。其不相同之點，便是天真的喜劇昧于事理，故易于失敗，而嚴肅的喜劇，則有最後成功之可能。

近百年來的歷史，是吾人一部受痛苦的歷史，但是也是吾人不斷地設法從悲劇地位走上喜劇地位的歷史。也就是說，牠是吾人力求不斷理解客觀而獨立的歷史命運，進而支配這個歷史命運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吾人力求不斷理解客觀而獨立的歷史法則，並進而為支配這個法則作主人的歷史。只有人在理解之中，能自覺地說明並掌握這法則之鑰，方能使實行者得到最後的成功。

這鑰在理智上來掌握歷史之鑰，是吾人的責任，即中國思想家和學習思想

者的責任。現在我們在這裏就是在嘗試說明這個法則的鎖鑰。牠也便是我們研究近百年史的意義。

吾人已知，吾人之所以陷于悲劇狀態中，實因受歷史命運即法則的支配。這換一句話說，便是吾人現有的狀態乃是過去發展的結果；沒有過去，決沒有現在，吾人又知這種過去對於現在的意義，便是所謂歷史的作用。它的行程是客觀的和獨立的，只有我們加以意識的研究，方能獲得理解。所以這種研究名為歷史的研究。

吾人要知道這種歷史的研究，對於吾人是怎樣地重要，可分以下幾點來說：第一，因為吾人在知道現在為過去之結果以後，吾人便可知我們現在失敗或成功的原因，由此，吾人便有可能力圖消滅他的失敗原因，而發揚可以成功的原因。第二，因為吾人由歷史研究能知吾人現在于過去和將來之中所處的地位。原來整個人類團體的發展，也和一個人的有機體的發展一樣，是有一定的程序的，例如有他的幼年，童年，少年，及青年老年之程序；而且也有疾病衰老之現象的。吾人若由研究理解了這些程序和現象的道理，則吾人亦即能確定我們現在應有正確的努力。第三，這種研究能使我们理解自己及他人種種已有努力之教訓。須知大家對於客觀的認識，雖然都在力求其正確，但是，有歷史數世紀的失敗而還不能明白者，這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因素的複雜，他方面亦因吾人自己有一種偏見和衝動力，非經若干時間，就不能消除，所以這些失敗教訓的研究，也極關重要，我們研究了牠們，就可以糾正吾人的偏見，並且避免再犯他人已做之錯誤。

這裏，我們可以舉出幾個實例來說明。先就我們中國來說。中國為什麼陷於衰弱狀態中呢？大家都以為由於外來強國的侵略。但是，為什麼過去日本也是同時受外來力量的侵略而反而興盛呢？受外來強國的侵略不但不因之而衰弱，反因之而變成強國者，不惟日本為然，其他國家也不乏此例。古代希臘是受波斯威脅的，但是希臘不但不會因而此成爲附庸國，反而因此急起直追，終

於在希波戰爭中戰勝波斯，一躍而為海上強國。但是，中國為什麼一經打擊便受屈服呢？這顯然由於中國之為中國，其當時情形，是和其他國家不同的。而中國此種不同，便是因為中國當時的歷史發展是正處於自己衰老的時期，而中國此種衰老時期又是緊接過去繁盛時期之後所必有之結果。反之，日本和希臘都是在他們的歷史新生的時期。這樣一種歷史發展情況之不同，遂使他們接觸外力時所生之結果亦不同。如果吾人不從中國本身歷史邏輯上去求中國近百年來被外人侵略之原因，則吾人對於自己復興的道路和應有的努力，便茫然無所知了。事實上，因為不知此種歷史因素而造成的錯誤，早使中國的復興延遲了許多年，這是何等嚴重的試驗啊！

上述這些錯誤亦即是我們對於自己歷史地位缺乏認識所致。說起吾人因為未知所處歷史的地位，而做出的錯誤，實不知多少。在五卅運動以後，吾人曾歌學習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榜樣而追求吾人之自由和解放，但吾人並未獲得法國革命所得的結果，為了這個試驗，不知付了多少代價。吾人又曾學習一九一七年俄羅斯革命的榜樣，但吾人亦未獲得俄羅斯革命所得的結果，而如此吾人又不知付了多少代價。但是，不錯，錯誤是難免的，但是錯誤應當獲得教訓呀，可是事實不然。當吾人嘗試法國大革命而不得結果，嘗試俄羅斯革命而不得結果之後，吾人只簡單把此種嘗試拋棄或中斷了，但尚未知其所以然，不但如此，今日吾人仍多搬演此類無歷史知識之談，這是十分危險的。

由以上所說，我們可知此後吾人對於歷史研究之重要。吾人由此知道此種研究是如何足以引導吾人走上正確之路。吾人現處悲劇狀態之中，吾人今日的責任是認識這些支配吾人之悲劇命運，庶能轉移此種命運而促進喜劇的到來。這樣看來，吾人愈能有歷史的知識，便是愈能認識自我。愈能認識自我，則對於以後民族發展之推動，便也愈有把握。

歷史上對於自己民族歷史命運認識愈清楚者，則他之創造和發展自己的民族亦必較他人為發揚光大。我這裏只以近代德意志民族之創造和發展來說。吾人知道，德意志民族原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並且國內是四分五裂，一如吾人之中國。在這時候，和德意志同處於一洲或為鄰的英法，已走上進步國家的道路。英法民族如何達到其先進國的地步呢？是由於英法的大革命。於是德國人在其初期為自己民族之解放，乃亦學習英法特別是法國式之革命，但是德國人在此運動中並無所獲，而國家之黑暗如故。於是德國人知道德國歷史傳統和歷史法則和英法的完全不同。英法的榜樣決不能使德國民族創造並發展起來。這樣一方面使德國人進而研究現狀，把它當作自己過去的產物，而此產物又當

為自己此後發展的條件；他方面，他們又將自己歷史和他人歷史作一比較，發現其中顯明的對照，因而更認識了自己的地位。德國人發現了什麼呢？他發現英法的革命是在他們兩國民族早經統一之後，而德國却尚遠落在分裂的泥沼中，德國和英國在歷史觀點上說，不啻差了一個時代。德國當時所重的乃是有機社會的形成，而英法却早已形成了此種社會。至於德國此種分裂現狀却是由於它自身過去歷史所造成的。正因此故，德國始為英法之奴役。提倡英法式之革命，徒足以破壞此種社會全體的形。社會全體不能形成，則個人自由決無在此國內達到之可能；英法式個人之自由，本係在他們社會全體形成之後達到的。這裏我們所舉，不過其大者之一端，而德國由於本身及對他國歷史比較之研究所得者實不止於此。蓋德國人由此所發現者為包含於人類社會及民族社會中之另一真理，由此，德國人舉凡在政治制度上，歷史學上，以及全部人類其他思想上均造成了輝煌的成就。此一真理之最高表現，乃是在其民族之古典哲學中。古典哲學為其所發現真理之集大成，而且亦為一般人類思想之一集大成。吾人應當注意者，即是由於德國人之自覺的歷史研究及他們之形成此種真理及思想，係遠在他們的民族造成及發展之前。這即是說德國人事實上在未創造民族之前，即先已有創造民族之思想。在德國還未完全統一，德國哲人學者之此種思想已深入於德國人之中，而形成德意志精神。由此吾人可知他們民族創造之先期的覺悟，對於他們民族復興及強大的實際運動是有何等重大的影響。吾人如果回顧過去德國民族興盛之過程，及德國各方面思想之高度發達，吾人亦便不難找出其中的因果關係。

這就是一民族有先期的認識，指導其民族發展，足以導出偉大民族之最好例證，由此而言，吾人實應當依照這種例證以引導吾人之民族。

由這一點，我欲首先指明吾人中國近百年史之特點。吾人近百年史之特點證明吾人可以有比復意志及其他所有民族更大的成就。

研究中國近百年史，吾人不能不記住一件事，即這所謂百年史正是中國和西洋大規模接觸的歷史。中國近百年史所以能特闢一章者亦以此。正因為近百年是中國歷史和西洋史接觸的一章，所以這個歷史方是吾人中國民族之失敗和復興的歷史。也正因此，近百年史和今日中國事件發生密切的關係，因為現在的事件是吾人民族在失敗之後力圖向上歷史的繼續。

中國近百年史之為中國和西洋真正開始接觸的歷史，這又是什麼意義呢？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德國人能夠獲得其指導民族之真理，是由於他們能夠區別過去和現在及其相互關係，同時能將自己和他比較。吾人應當知道的，

即德國人所以能啓發其深沈的歷史思考，即是由於本國和英法那種特殊的對照；這種對照在當時是如此明顯，使德國人立刻感覺到歷史的差異。吾人應知道，所謂歷史的研究，便是一種比較的研究，歷史的方法，就是一種比較的方法。沒有比較便沒有真理的出現。沒有黑，看不出白，也不能有區別黑白的真理。事實愈複雜，則所獲之真理也愈深廣，真理並不能孤獨存在，正如叔本華所說，燈塔之所以大放光明，正是因為燈塔周圍有被他照出的四方八面。德國人之所以能有他的廣大歷史研究者，祇是因為他是一個後進者，他所賴以顯現的四方八面比英法為大。為什麼英法不能有比德國更大的歷史知識呢？是因為英法是先進國，他們並沒有比德國更豐富的歷史經驗。自然，法國的所得經驗要比英國所得者為多，同樣，英國也比英國以前的為多。先進國有許多須獨自摸索，但後進國却可利用先進國已有的經驗。這種已有的經驗的利用，不祇是簡單的佔有而已，而且是由於諸種複雜成分的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前人所未能知的真理。故國際的舞台愈廣大時，則一民族所得於歷史者實至深且遠。

就這一點說，中國比德國將能吸收更多的知識，是很明顯的。吾人於此應當注意的就是近百年中國乃是以整個東方的資格和西方接觸，而這種東方歷史及其文化和西方歷史及其文化是代表世界文化兩個最大的系統。在以前，德國和英法的區別，都是在同一西方歷史及其文化之內的差別，而現在中國和西方各國之比較，不但是國與國之間的差別，後進國和先進國的差別，而且是兩個系統的差別，在地域上說，他是地球上兩極端的差別；則其意義之重大，及其所能予吾人的教訓的地方要比德意志大過好多倍。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中國在一百年以前，其眼光只限於一國之內，換言之，也就是限於東方世界之內，我們中國人數千年來，並不知道吾人歷史發展有什麼特點，因為我們的這個大燈塔並沒有他的四方八面可以用以顯現出他的光明來。即使他內部有無限的透光能力，也不過是像一架塗黑的望遠鏡一樣，什麼亦看不見，看不見別人，因而也看不見自己。但是自近百年來和西方正式並且大規模的接觸以後，情形却完全不同了。由於和西方的接觸，看見了自己的特殊形相。這些形相在以前我們每日生存於其中，却一點也不知道，現在西方世界做了我們中國，我們東方世界的一面鏡子。

這不僅在東方是如此。在西方說，也是如此。在西方本身各國雖互有比較，並因而認識其各自的特點，但是整個西方世界的一個共同特點，自己並不能知道。現在自從和中國，我們的東方世界接觸之後，我們才驚異地發現西方世界的發展，並不能代表全人類歷史的發展。由於和東方的對照，我們才第一次

知道原來西方世界發展的方法，不但不是全人類發展的方法，反而是西方獨有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反而是人類共同發展中特殊的例子，這是何等的驚人呀！這種西方特殊形相的發現，只有在和我們中國，我們的東方世界接觸之後，在我們鏡子之中才能表見的。

這兩種東西方世界的互為表見，將世界的歷史知識，及一般的思想，推到比以前無限高度的峯巒上去。這一種東西方歷史的互為表見及其知識真理的發現，是包括在我們近百年史的研究中，也必須包括在我們中國近百年史的研究中，這種研究將引導中國民族創造及文化發展到比德國更高的地步。

也正因此故，所以歷史的研究及由此研究所得出關於中國民族的導引，有了特殊的意義。中國近百年史的特點，就是在於他是真正的世界普遍史的交流，和集合點。一切的因素，同時在近百年中的中國史中表現，並且同時在近百年中的中國史中起作用。不理解的過去我們中國以及東方世界歷史發展及其特點，我們便不能解釋近百年中的中國史。同樣的，如不理解西方世界歷史的發展及其特點，則我們亦不能知道近百年中的中國史。短短的中國百年史，在空間上是必須將整個東方及整個的西方包括在內，而在時間上，不但要包括近百年中的中西的事實，而且東方史全部的時間及西方史全部的時間，也要包括在內。因為他恰好成為東西古今的一個交點，故這個交點在近百年中國史上才能集中表現出來。

由這裏看，我們研究近百年中的中國是需要怎樣廣大的眼界，吾人必須在高山遙遠的頂上，方能將中國近百年史全形看得巨細無遺，這就是我們所要做的。吾人應知道這是何等鄭重的任務，但他亦說明這工作的性質和意義。

最後，我要指出的，便是吾人歷史研究之這種世界史的性質。除了以上所述我們的研究必須從世界史的見地以外，吾人在情感上，實還同時必須具有世界史的胸懷。吾人現在為了創造一個民族及其將來，正在進行重大的努力和研究，吾人由此將產生何等民族的情感，那是不消說的。自然，吾人的情感，並不是憑空的，而是建立在歷史觀點之上，吾人因看見吾人可以有無限的前途，不禁抖擻精神，直趨前赴，但是我欲特別說明的，即吾人的情感決不宜限於一民族之內。現有的民族不過是人類結合的一種形態，而人類將來有更大的結合形態。吾人由此知道，吾人民族之創造將為世界文化創造之標幟；吾人歷史之發展，即已證明他是西方發展原則及東方發展原則之混合。在本身已帶世界之意義。所以這樣，吾人可以避免狹隘民族之偏見，而與世界之潮流合一，只有將吾人民族歷史及民族文化之創造放在世界歷史的脈搏之上，吾人民族及其文化的創造，方有最崇高的意義，而吾人民族之偉大情感方轉化為世界人類

的情感。如是吾人情感方達到最熱烈的地步。

菲希特在他的「告德意志國民書」中，當他的本國國民正墮落於利己和爭權奪利而陷於破滅狀態的時期中，發出其喚醒國民靈魂的呼聲。他指明人類的特徵，就是在乎他們的生命的同感。本來人類之所以和其他自然界及其他動物界不同者，是在於他們是有高度的生命同感。生命同感，是人類能成爲總體並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在人類本身說，這種生命的同感之程度愈高者，則是表示他爲一高級的人類，反之，便是低級的人類。人類中的個別生命，雖然是互相衝突的，但是他之邏輯的結果，必定是趨向全體生命的一致和共鳴。所以有遠大理想的人就是能够立於這個全人類生命同感的尖端之上的人，他在這個高度生命同感之中求得他的最高精神的愉快和滿足，因爲他和吾人生命本質之弦相協和。凡是不顧全體生命同感的本質，而發洩其個別生命的愉快者，則這種愉快便是低級的愉快，肉感的或官能的愉快，這便是菲希特所謂的利己心。這種違反生命本質之個別利己心發展的結果，非達到全體生命的破滅不可，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菲希特的尖銳的呼聲，就是指明那時德國民族中低級的利己心的發達，已使德國民族破滅了，所以他認爲唯一挽救的方法就是從提高生命的同感及認識生命的真正本質入手，使德國人能知在這種同感的同感中，求得自己最高的愉快和精神的滿足，然後民族方有希望。

這裏就是德國人在他們自己民族的創造及發展中所感覺到的無限高度的民族情感，這是必然的而且是應有的。但是菲希特是否會由此養成一民族狹隘的偏見呢？不然，菲希特會明白說明這種生命的同感不但在德國民族中應當如此，而且應當推之於全人類。不過他們既然是德國人，就希望先從德國人做起。這是完全對的，我們中國人也祇能先從中國做起，但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也許能比菲希特更明白，也應該更明白。這也是我們和他們不同的一點，我們處於最廣大的世界，應當自覺地站在這個立場。

但是無能如何，吾人之民族創造及歷史的研究，總是以近代德意志爲吾人的模範。我這裏不厭重複地引他們民族中偉大哲人黑格爾下面的一段話以結束本文。這些話完全是由於冷靜的考察和高遠的歷史研究獲得的。它實爲今日我們中國和我們中國的思想界的借鑑：

「只有知識是唯一的救星，唯有知識能够使我們對於事變之來，不致如禽獸一般之儼然吃驚。亦不致僅用權術機智以敷衍應付目前的一時，唯有知識才可以使我們不至於把國難之起源認作某某個人一時智慮疎虞的偶然之事。且可以使我們不致徒與強權之勝利與正義之失敗的浩嘆。」

中 和 印 刷 廠

承印：中西書籍 刊物雜誌

辦事處：浙江路三五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印廠：淮安路七二七三〇號

龍 虎 人 丹

保 健 救 急 人 人 必 備



上海中華藥業公司出品

(新 型 電 機 織 造)

哪 吒 牌 天 狗 牌

本廠出品

歷史最久 牌子最老
定價最廉 貨色最好
如蒙光顧 任憑比較

發行所：上海老北門紫雲路五七弄十二號
信字機廠 電話八三九七〇
小南門外王家橋頭街二八一至五號
製造廠：電報掛號一七六六

革。新。運。動。的。起。點。

李毓田

時局愈動盪，革新聲浪愈高漲：今日成立一會，明日組織一社，每一會、社成立，照例有一篇堂皇的宣言，對於時局的分析，無微不至，對於革新的主張，頭頭是道；人人都好像是旋乾轉坤的中興政治家，總以為「你們搞不好，讓我們來便有辦法」。其實，這種看法，未免過於天真；因為無論「你們」或「我們」，還不都是中國人嗎，中國人智、愚、賢、不肖，固然有等差，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中國人有一種自私通病。這種通病，若不革除，中國革新是永無從談起的。

思想產自環境，行為發自思想。民主政治，最早產生於希臘，Democritus，即自希臘語而來。一八九一年在埃及會發現亞里士多德著「雅典憲法」一書。故西洋思想，自古即以自由、平等、公共福利為主流。柏拉圖在其「國家論」中，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市民平等，在國家施政之下，全市民營共同生活，廢食與共。他認為統一為國家之本質，其所以能够獲得統一，即由於臣民各自完全屏除自私心，而將身心貢獻於國家之故。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論」中說：「我們欲求完全的政府，不得不確保社會全體的最大幸福。」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因承認奴隸且輕蔑勞動之故，將於人格的尊嚴，不免有缺陷，而訂正這個缺陷者，則有猶太教、基督教。英國彌勒在其「立憲政體論」中，

會謂：「預言者之天才，是以神之權威，以訂正國民之信仰與道德之誤謬。一美國之革命與建國，即直接受猶太教之影響，而法國大革命受猶太教的影響，亦甚大。基督教為猶太教之革命繼承者，且復為教導歐美人自由、平等之真正淵源。耶穌反對現在的國家及統治者，終其生為其理想的天國做宣傳。在他腦海中的天國，人人都是善良公正，親愛如父子兄弟，飢者送食，寒者送衣，沒有貸利的思想，不爭地盤，不奪權力，不知犯罪，沒有君王、官吏、人民、奴隸、財主、窮人等分別。西洋社會主義的發達，不能不說是得力於這種基督教的思想。

中國思想，自古以孔孟與黃老兩派為主流，但前者雖兩千年來不斷的享受歷朝供奉，不過徒擁虛名。况自漢武帝以來，號稱百家一尊儒術，實際上後來的儒術已經變了質。漢宣帝且說：漢家自有法度，雜王道霸道用之。再進一步講，儒家所講的是道德政治，民本主義，只能看做啓蒙專制主義，亦並無民主思想成分在內。故支配中國人思想的，只是黃老思想。代表黃老思想的，是老子「道德經」。據金兆梓氏考證，這書大約成於漢文帝。這個老證是否正確，可不去管，但黃老之學都是到漢文帝時纔開始興盛起來乃是有線索可尋的。據他說：「大概黃老之學，在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本只傳於齊地，這由史記樂毅傳和曹參傳可以窺知；由蓋公傳給曹參，惠帝二年參入相，大約此時始入中朝。恰好負教惠帝的郎中令陳平也好黃老之術，經二

人一提倡，黃老學便漸盛。參死後，平繼為丞相，直至文帝二年纔死於位。文帝因他有平諸呂功，且諳政術，不似並相的周勃那樣推魯無文，很看重他，大約便在此時陳平將黃老之學，傳給文帝。自此以前，只有黃老學，從未說及老子書。文帝本以藩王入承大統，有點心不安，故一切「以下為基」，用以柔克剛的手腕穩安於位，黃老之學自投其所好，而且也正用得着；同時，又得一位同志的竇太后，於是黃老之學，經他們帝后二提倡，也便自然大盛。（學藝十七卷三號）文帝勸諸王及其大臣都讀老子書，至文帝兒子景帝且改黃子老子為經，不備勸諸王及大臣讀，進一步更勸令老百姓也要讀了。老子的思想，是極端個人主義，「道德經」即講求權謀詭詐怎樣應付人的一篇自私論。例如他說：「江海取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說：「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文帝勸諸王及大臣讀此書尚猶可說，為的是統治萬民；景帝勸令老百姓也要讀這樣的書，則真不知是何用心？

楊朱祖述老子，所謂每况愈下，不料由老子的極端個人主義，竟演變為極端放情縱慾，自暴自棄了。楊朱說：「百年壽之大者也，雖然，達於百年

者於千人無一人焉。」又說：「人之生者奚為哉？奚樂哉？曰：鮮衣厚食之為爾，馨香美色之為爾。」又說：「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向者死也，生則有實最貴人，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又說：「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趨富生，愛趨死後？」這種思想，對自已無向上進取精神，對社會無責任心，更談不到對文化的創造與國家之愛護，而只一味地求得個人舒適、安逸、享樂。清人楊慶堃說：「嗚呼！推楊朱之罪，則亦何止於此。夫楊朱而持者，亦視君主也。然於現世之中，不免為人生應盡之責，而往往以鮮衣厚食馨香美色為樂，至教人不為仁聖而為兇愚，不為堯舜而為桀紂，苟偷俄頃之歡娛，以解一死之憂，生前死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顧。……學孔子則正難，而學楊朱則正易，學孔子則正苦，而學楊朱則正樂。人情莫不趨難而喜易，避苦而趨樂，於是其躬不問，遺德我後，遂為中國普通社會思想。」（梁啟超中國之近世道序）楊朱思想，最初盛行於魏晉六朝，到現在可以說達於最高潮：試看：一方面在殺戮流血，凍死餓死，一方面則仍不是在天酒地盡情享樂嗎！

老子與楊朱的思想，並非就是他倆個人的獨創，而實是集先秦社會思想的大成，不過，藉他倆之口或筆道出而已。中國不幸，竟被這種思想，支配了數千年之久，而造成今日社會的大危機。

二

英國自八二七年威塞克斯王愛格伯 (Egbert) 統一之後，二二一五年大憲章成立，中間只經過一六四六年及一六八八年兩次革命，從此國基永固，四百六十年來，從未發生內亂。美國自一七七六年

獨立建國，除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年南北戰爭外，將近兩個世紀，亦從未見內亂發生。可嘆我們的為周朝八百年，但中間內亂頻仍，漢唐明清幾個盛世，不過各二三百餘年，平均起來，每個朝代不過百年左右，每換一朝代，便大混亂一次，短者數年，長者二十年。中國立國號稱四千餘年，真正治世恐怕不到千年。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王政復古明治維新以來，迄今正八十年，除中間會發生「佐賀之亂」與「西南之役」兩次短時間內亂外，可以說很順利的踏上君主立憲道路，國勢蒸蒸日上，由不足道的小島國，竟一旦躋於一等列強之林。中國不亦是搞過戊戌變法嗎？何以竟一無所得呢？

俄國地面遼闊，種族複雜，沙皇政府根深蒂固，又加之在強敵侵略之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本不是件容易事，但經過一九〇五年革命與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不過四五五年間，革命大業便告完成。其間各地雖發生了不少的暴動，然除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拉夫人暴動規模較大，時間較長外，其他幾項，革命政府很快的便把它們平定了。俄國在一黨專政制度下，三十年來，國勢日強，幾席捲歐亞，從未聞有何內亂發生。中國革命，搞了六十幾年，後來且聯俄容共，亦仿效過俄國一黨專政制度，然終究是停滯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階段上——內亂連年，迄無休止。

第一次大戰後，法西斯獨裁政治盛極一時，一九一九年從義國半島組織起，不數年遍及歐、亞乃至南美。這種制度，雖說是反動，不足為訓，但它能夠統一了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都是從破碎混亂的國度裏，建立起整體的秩序的社會組織，在這種組織下，人民尚能居能業，固然不一定安居樂

業，總比現在的中國不能居不能業求死不得的老百姓好得多了。義、德兩國假若於統一全國後，外而與鄰邦友好，內而採施民主政治，只拿法西斯獨裁政治作一種過渡手段，也何嘗不是辦法，未可厚非。因此，中國會採用這種制度，不是無理由的。不過，當中國採用這種制度時，並未能收統一之利，用之不當，反而弊害叢生，這又是教人所想不到的了。

第二次大戰後，法西斯潰滅，民主政治抬頭，義國、日本都已革面洗心，中國自然當仁不讓，於是便也召開國民大會，訂立憲法，實行民主政治，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等，這次革新總應搞得好了，起碼不要再落在東鄰無條件投降的小日本屁股後頭。然而，就這次國民大會及行憲首屆立法院行政院情實看來，倒確實難令人樂觀。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的產生，是先由政府遴選候選人，遴選標準不公平，全靠派系親疏，而於遴選候選人後，再加以指派（若干省國大代表都是指派的），分配票數，包辦選舉，口口聲聲說是「民選」「民選」，一般老百姓連選票是什麼樣子却都搞不清。此其一。號稱「來自民間」的代表、立委，都很少在如何解除民間痛苦與如何為民間謀公共福利上着眼，而大多數代表、立委一開頭都孜孜於本身的權勢之擴張與待遇之特別提高，例如國大要求簡任一級待遇，搭乘國營交通工具一律免費，立委更進一步關起大門秘密會議，討論特任官待遇、分配洋房、汽車與每人雇用秘書等等詭譎舉動。行憲後行政院，本應一新耳目，盡量招致一般精明幹練公正有為的新份子使之組閣，以代替過去那些腐敗無能的舊官僚，這纔是刷新政治，激厲士氣之道，但結果閣員名單都是走馬燈上的爛熟的人，老百姓早已都嚐過他們的高教，這次再上台，豈

能够希望他們翻出什麼花樣？

無論改朝換代也好，維新變法也好，革命也好，一黨專政也好，獨裁政治也好，民主立憲也好，爲什麼人家都能成功或收效，而中國樣樣都嘗試了，樣樣都不如人呢？這是應該教我們深省了！呂拙文氏在「論中國社會的一種隱憂」一文中說：「愈是動亂紛紜時代，愈是這一由游民集團脫胎而出之武夫集團佔主動的時代。也愈是若輩顯親揚名的黃時代。也愈是若輩顯親揚名黃金時代，他們只有一個目的：盡量向社會的頂尖爬，別無其他原則，更談不上什麼主義政綱。你給他吃飯，給其做官，予以享受，他就聽你的話，服從你的命令。他們今天擁護某某，明天向某某倒戈，問題與國脈民命毫無關係，全在誰給他的待遇優越。所謂『有奶便是娘』，事實就有這末簡單。所分不過是誰是娘誰是親視娘而已。民國以來的軍閥升沉史，倒下來和樹起來的，數目容有小異，旗幟或有三色五色之分，本質則依舊未變。他們爲什麼東親西倒？一部五代史已爲我們留下解答，無非是找靠山，求生存，求更好的生存升官發財而已。」他把中國社會的隱憂，歸結於武夫集團，而武夫集團何以新陳代謝層出不窮？最後，他結語爲「由於這個社會制度逼出來的」。〔再生二〇九期〕蘇誠鑑氏在「中國歷史的變遷」一文中說：「在我們歷史上，自來有兩種朝代更替或人們想做皇帝的方法，用兩個最老的歷史例子，就是『堯舜禪讓』與『湯武革命』，這兩個方法，就是『禪讓法』與『革命法』。……在我們歷史上禪讓法實行者少，或者是徒有其表，真正得天下的還是『打』來的多，這就是我們民族最大不幸。我們之作此語，並不是以爲『禪讓法』比『革命法』好，或含有反對革命之意，在本質上二者原無分別；而在方法上，比較而論，禪讓法可以

不流血，不傷元氣，不損害文物建設，以取得政權，比『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武力革命的方法要好得多。」（三月七日上海大公報）呂蘇兩文爲近來分析中國亂源不可多得的文章，不過一個歸結於社會制度不好，一個歸結於取得政權方法不好，並未能抓到中國真正亂源的核心。

歷代內亂所以頻繁，不僅是奪取政權的方法不妥，更因爲是人人想做皇帝的私心。每一大英雄奪取政權，必有若干小英雄扶佐之，迨把舊勢力推翻，政權到手，小英雄不甘人下，又想推翻其首領，首領因此要削平英雄，要殺戮功臣；故每經一次改朝換代，往往內亂有一二十年，是爲一治一亂，循環不已，豈是「聖人所留」，實因私心做祟。到了滿清末年戊戌變法，如果成功，本可打破歷代長期流血轉移政權的壞傳統，但以那拉氏爲中心的反動集團，却深恐變法一旦成功，對於他們個人大大不利，所以一經袁世凱背信告密，便把維新主腦者一予以處死。袁世凱這個壞蛋，從此掌握了大權，後來他還做了幾天皇帝。武昌起義後，因革命黨員互爭領導權，水火不容，因此造成南北分裂之局，內亂一二十年。孫中山先生因鑑於此，所以後來特別提出「天下爲公」的這個口號，正是對症下藥。無奈革命新風氣尚未養成，孫中山先生便爾中道崩殂，從此國家民族前途遂不堪開問了。「天下爲公」變成「天下爲私」，上下交相私，三十年來的政治，即私的政治，國家即私的國家。先就人事方面講，只重私人關係，而不重學識能力，故政府機關變成祠堂或同鄉會館。就工作方面講，公私不分，且先私而後公，甚至因私而放棄公。就物方面講，公物不就是私物，公家汽車接送兒童上學，老媽子買菜，太太小姐兜風，視爲當然。太太化粧品費用也劃在公家賬上，竟無一個人敢去稽查稽查。就財

政方面講，用公家的錢可開公司，以操縱市場，用公家的錢可任意買外匯，大做其國際貿易。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做大官的的私，做小官小私，只要有權，就用權還私，只要有力量，就用力營私。做官的人自私，做人民的也私，稅吏要錢，工商業者就賄稅，有了私的縣長，就有私的劣紳，有了貪的省主席，就有刮地皮的縣官。這樣大官中可以產出豪門，小官中就有不斷的買田置產者。所以，中國只有私人的財富，沒有社會的資本，私人的財富，只供自己享樂。有錢的人，儘量的把錢移存國外，準備過洋化的生活，有錢少的人，把鈔票換成金銀或外幣收藏起來，以備逐年逐月消耗，就是財富被私的觀念把握，就多變爲消耗的工具，當然不能爲生產而運用，這樣把社會越弄越窮，國家的財源愈來愈少，就是窮由於私的一個說明。」（文化先鋒八卷九期汪洪法氏穩定當前局勢的幾個意見）

三

自私本爲人類天性，西洋人及會領教過西洋思想與佛儒思想的日本人，何嘗不都自私。不過，人家自私，不懂私個人，縱然私個人，也有個限度，更能私國家、民族、社會，他們能以私國家、民族、社會的心，勝於私個人。他們懂得「水漲船高」，更懂得覆巢之下不會有完卵的道理，假使國家、民族、社會搞得好，個人自然會享其利，反之，個人自然會受其害。只有我們中國人，明知今日是處於將覆之巢中，但有權的人還處處在想把握，仍不肯把權分讓於人民，有錢的人還想盡方法在積聚財富，仍不肯把錢捐獻給國家、社會。

所以，革新非先從我們人的本身做起不可。怎樣纔能革除幾千年來這種傳統的自私毒素？這實是我們這一時代智識份子重大的使命！（六月十四日）

介紹 費邊社的主張及其活動

自恩格斯發表「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社會主義為空想的，而以馬克思社會主義為科學的」論說後，於是左派學者遂以凡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概以「空想的社會主義」視之。其實，馬克思主義亦並非科學的，德國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及法國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t) 都早已講過了。凡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到現在大都消聲匿跡，罕見聞傳，只有一派自產生以來，即以馬克思主義為對頭，始終奮發向前進展，頗有取馬克思主義而代之之勢，這便是英國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也。

費邊社 (Marcus Fabius) 本為古羅馬名將，有持久將軍之稱，這社便是借用這位將軍之名而起的。費邊社曾為自己做一種標語說：「有時候你當等待着，和費邊一樣，當費邊和漢尼巴 (Hannibal) 戰爭的時候，雖有許多人責備他遲延不進，他却不動，只一味堅守不動，但是當時進攻，若不為是，那麼你以前所等待的時間，便都算白費了，是沒有結果的。」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很複雜，一般社會主義者尚不受馬克思主義的拘束。馬克思主義到英國是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所引進的。可是，當馬克思主義到了英國，費邊社在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 (距馬克思死後大約六個月) 便亦成立了。這派的社會主義來源，承自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和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的思想，而尤以受後者影響為最深。當時英國政客和社會改良家，認為貧窮是由墮落、酗酒、低能、懶惰、浪費所致，國家對於這些事體，除應用某種平常所習用的方法糾正外，如果再用他法去干涉，也是無效的。然而喬治在他「進步與貧窮」一書裏，對這種論調却加以激烈的反對，他率直的說，貧窮是起於社會分配的不平均。

組織費邊社者，是德爾孫 (Thomas Davidson)。他是蘇格蘭人，住在紐約，他是一個有名的辯論家，和心理學家。當一八八三年秋季，他在倫敦許多小團體演講他的學說，他籌出一種計劃，要組織一個社會，從事於更優美的生活，他稱這種生活為「新生活」 (Vita Nuova) 當他離開倫敦的時候，以前跟從那班人決定繼續這種演講會，但他們對於他的烏託邦理想却不復相信了。只有少數人組織一個新生活社，依照他的學說去實行，並且發行一種季刊，叫做「播種之時」 (Seedtime)，一連出了好幾年才停刊。當時他們大多數人都主張改良社會，到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他們在倫敦便共同組織了一個團體，依照卜德維 (Frank Podmore) 的提議，稱這個團體叫做「費邊社」。

費邊社社員決定在播種之前

須先從事預備和研究一切必要的工作。創立人除德爾孫、卜德維外，尚有布爾德 (Hubert Bland) 及其夫人納士得特 (E. Neadb)，皮司 (Edward R. Pease) 等等。首先入社的是蕭伯納 (Bernard Shaw)、韋伯 (Sidney Webb)、艾禮衛 (Sidney Oliver)、克拉克 (William Clark) 和貝山夫人 (Mrs. Annie Besant) 等。

當時，馬克思的「資本論」僅通行於法德兩國，英國社會民主聯盟會員認為馬克思的價值定律 (Law of Value) 確為社會主義之基礎，而馬克思的革命方法，亦認為不可避免。但費邊社社員既不同意馬克思的價值定律，更不贊成馬克思的革命方法。他們主張不參加暴力鬥爭，而認爲用和平手段，宣傳社會主義，亦可達到改革社會制度之目的。它的手段，就是解放私人及階級所擁有的土地和工業資本交給社會，以便增進公共利益。若能做到這一步，一國所有各種自然的和既得的利益，便能夠公平分配於全體人民。因此，對於私有土地，藉土地而徵收租金，以及利用土地的肥沃和地勢而獲取大利等事，它主張一律廢除，並實行從事於這種廢除運動。還有，它主張凡社會所能夠管理的工業資本，統通交社會去支配。因為在過去，生產工具既是一種專利品，於是工業上種種發明，以及歸入資本的贏餘進款，大概都歸了物主階級的私囊，致使一般工人現在只能夠依附這種階級，謀一點生活。上述計劃果能實行，

那麼所有租金和利息等等都可免除 (然社會如認適當時，對於喪失租金和利息的人，仍可予以救助)，都可做爲勞動的報酬，像現在那種游手好閒依賴別人血汗而享樂的人，到將來，一定會要消滅的。於是，實際上的機會均等便可以維持了，而個人的自由也不致和現行制度一樣，處處受限制了。費邊社爲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注重傳播社會主義者的意見，使社會上政治上因此而引起變化，男女得爲平民國民。爲的是要引起這種變化，所以它竭力傳播關於個人和社會間在經濟、倫理和政治方面的種種學說。

其活動可分爲如次三種

(一) 出版：例如一八八七年刊行韋伯的「社會主義者須知」 (Facts for Socialist)，徵集各種事實，對於資本制度，作一種破壞的批評。一八八九年刊行「倫敦人須知」 (Facts for Londoners)，對於倫敦各種制度詳細作一種統計的解剖，並提出具體改革方案。一八八九年刊行「費邊社社會主義論說」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這書是將社會主義從英國人的眼光中描寫出來，而省去了馬克思主義的那些奇異的成語。以上這些刊物，都是轟動一時影響英國制度很深的名著。

(二) 講演：例如一八九〇年組織若干講演隊，想把從前除了倫敦便無人知道的費邊社主義擴充到各工業的區域中。他們向一般激進派、協作社會、和各種願意聽講的羣衆機關極力講演，鼓吹他們的主義，因此英國各重要

城市都有費邊社的分社。

(三) 參加實際政治工作：他們的社員不僅領導所有英國社會主義及若干職工聯盟活動，而且費邊社有許多社員在政府當一等事務官，甚至次一等的事務官，他們把政府當做一種精巧的機器，政府的事務是他們所管理的。他們草擬各項文書，因此遂掌握決定全國各附屬機關、各郵政局、或各海關中所應守的政策之權。他們預備內閣各開具的演說詞，並且擬出新法令初次的大綱。這些事務官對於政治的行動，很有許多影響，這是爲局外人所不知道的。選舉人的選票支配一個國家的效力，遠不及服務於國家的人腦子裏面所具的觀念，支配一個國家的效力來得大，至於這些人，不論是國會領袖，或永久不更換的法官，他們的效力都是一樣的。例如將倫敦各種獨佔事業都改爲公有，對於一般僱工給以工聯所規定的工資，等等事業，大半是由於費邊社在地方議會內外鼓吹之力。一八九三年獨立工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成立，其構成員差不多全是各重要城市費邊社分社社員吸收過來的。一九〇〇年工黨 (British Labour Party) 之成立，更是由費邊社所策畫的任過兩次的工黨內閣首相的麥克唐納 (G. Ramsay Mac Donald)，起初原是費邊社員，後爲獨立工黨黨員。現今英國執政黨工黨的首腦部即費邊社，工黨所有在政治上的各種措施，差不多都是由於費邊社數十年來所研究與設計出來的。

(相曉)

吹他們的主義，因此英國各重要

評書「亞洲沒有和平」

著者：伊羅生

出版者：Macmillan

定價：美金三元五角

本書著者伊羅生(Harold I. Isaacs)，是三十年代上海外國人中的名士，以主編「中國論壇」著名。後來，他突然捨棄第三國際，傾向托洛斯基主義。自離開中國監獄後，他曾赴歐訪問托洛斯基，和協助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馬林，並把在上海所收集的資料，著成「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由於上述的經歷，在抗戰期間他被「新華日報」(中共的機關報)痛罵為「托匪」。可是，日寇投降時，他以美國某大報訪員的身分飛至陪都重慶，又受「新華日報」的委辦。因為那時記者身份的伊羅生已經脫離政治組織，但却是國民黨政權的批判者。

伊羅生在這次遊歷的地域，幾遍亞洲。他曾會見安南的革命首領，中國的朝野名流，和研究朝鮮的問題。回美後，他發表表短文的，另寫「亞洲沒有和平」(No Peace For Asia, 1947)。他自出書起，曾得到若干的好評。關心亞洲問題的外國人，也很重視他。

伊羅生在這本書中，似乎要為他的讀者們提出這些問題：中國、印度、緬甸、安南、朝鮮和荷印在世界重新分割前正準備另一次大戰的情勢中，能夠取得自由與和平嗎？由於三十年代的他

是第三國際派赴亞洲工作的人員，和五十年代的他是美國的記者，所以能夠深入問題的核心；並從亞洲各國政治家，革命家的訪問與密談中，了解這個問題。他不備了解，還有公正的立場。因為他不是蘇聯的盲目讀者，同時也不是「美國世紀」的歌頌者。

伊羅生從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瓦解後的情況，觀察自由的亞洲。他感覺到久受帝國主義榨取的亞洲各民族，曾被美國的「民主」宣傳所欺騙。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鮮。這一民族，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馬上受新型的帝國主義所擄。結果，在美蘇對立中，朝鮮分為南北兩區，經濟麻痺。無庸說，第二個例子就是中國。

站在美蘇勢力圈之外的南亞，仍受英國的統治。大英帝國雖在崩潰中，却緊握香港和馬來亞。緬甸享受低度的獨立權，印度則為獨立而忍受分裂之苦，同時，又以優越之經濟的及政治的力量，支配泰國。至於身受亡國之痛的法、荷，則企圖恢復舊殖民地統治權，與重新獲得橡皮、汽油等重要物資的支配。

在上述區域，戰後的美國，應演大角色。伊羅生在本書中有引人注意的描述。他為讀者們指出：由於美國政策的錯誤，美洲人得不到亞洲人的歡迎。開始亞洲人尊敬美國人的情緒(他們視美人為解放者，具有技術的知識

，富裕等等)已逐漸消失。沒有殖民地的美國，本為自由的象徵；可惜，為美國政府援助舊殖民地的統治者(美國的軍火，裝備援助，法恢復亞洲的殖民地統治；重荷荷，法訓練陸軍部隊，從事侵略戰爭)，使美國在亞洲人的眼光中成為反動的國家。

至於蘇聯在亞洲的政策，伊羅生的著作也有深刻的分析。他歷史地敘述蘇聯初期的外交政策，所標榜扶助弱小民族獨立，自願放棄特權等等，曾得到亞洲諸民族的甚好反應。可是戰後的蘇聯，却恢復沙俄的作風，佔領滿洲與朝鮮北部，還與列強的見解完全相反。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強贊成沙皇的敗北，就把俄國在中國的政策視為「犯罪的」。史大林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的演說，則強調打敗日本是雲一九〇四年之恥。不僅如此。蘇聯對安南的政策，動安南共產黨聯合蘇維埃外交政策，不必反對蘇聯在歐洲的盟國——法國。

伊羅生在分析美、蘇對亞洲民族的政略後，曾就現狀，做這一結論：亞洲的和平與自由，係決定於美蘇分割世界的終止。由之，他建議：兩國撤出駐國境外的兵士，裁軍，及在廣大亞洲區域從事經濟的與促進社會進步的合作。但怎樣實現這一建議呢？伊羅生為他的讀者們指出必需有一個前提，即兩國家的政權經過根本的變更。美蘇是否有這前途呢？伊羅生並無自信的肯定。這等於說，他的著作，只有分析，並無確定的對策。

(未完)

開爾德論十九世紀西方思想運動的特點

十九世紀思想的大運動的特點，是一個從否定到肯定，從破壞到建設的運動。用卡萊爾所說的話，從永常的「否」到永常的「是」的運動。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就是一些如米拉博(Mirabeau)一流的人物都曾經吞嚥一切的方式，但是並沒有失掉他們對於人類的命運和精力的信仰。他們對於過去的壓迫與風俗習慣的生活之解放，更促進他們明瞭人類的信仰與希望之永久的基礎，人類之信心與組織所建築的永恆的基石。他們偉大所在是以他們思想的歷史，是否包括足以完全反映那時代思潮正與負的全部運動為標準；他們把握住歷史上衝突的成分。並且調解這些衝突使之成為構成他們自己內心生活的質素的程度愈高則他們便愈偉大。如果他們成為片面的思潮的反抗或反動的機關或發言者，或他們順着時代的潮流打滾，而以羣衆之意見為意見，則是他們薄弱的表證。他們被動的順從潮流趨於一個成分愈多，則他們便愈薄弱。在這種社會的，思想的衝突的潮流中，如果不從整個的歷史背景着眼，是沒有人能夠聚集全時代之精神於一身，並深入於相反的潮流中而得完全的同情了解的。在這種潮流中沒有人可以完全獨立；因為他自己是這個潮流的一部分。譬如當反叛運動緊張時，他絕難分別自由與無政府的異同，當建設時代來臨時，他絕難不利用舊的已經燒毀過的磚瓦木塊以

造新的大廈。沒有一個人是可以與命運開玩笑，沒有人是可比透得脫為時間和個性所限制的懲罰。任何人他能夠對於過去信仰之片面的否定與片面的肯定的發狂主義，他能夠不僅依據普通常識與臨時的便利，以作言行的指針，並且具有深遠的識度，緊握着不同的各方面的實在而統貫之，換言之，任何人能不隨時代潮流之變遷而變遷，而確能貫徹真正的進步與發展於其間，必定是於我們有最高的興趣，最大的教訓的因為這種人的生活似有一種小宇宙，從他們的生活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比較難於了解的大宇宙的教訓。所以必須有這種廣博的經驗，這種對於時代的主要的潮流的虛懷態度，和這種不斷的努力達到一種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可以了解並且調和種種不同的趨勢，而對於許多不同的偉大人物如華茲華斯(Wordsworth)，卡萊爾，孔德(Comte)，哥德(Goethe)等的生活均能得適當的欣賞與評價。而對於德國從康德開始的哲學上的大運動之所以有興趣，也因他們能夠代表這種博大寬闊的觀點。因為此運動也就在於尋得一條出路，由近代的主觀的自由理想——造成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與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的自由理想——而達到過去人類生活所基以維繫的思想和道德秩序之改造。

——錄自開爾德著「黑格爾」

神秘的西北角

西北是中國歷史的模型。旅行西北一次，就等於讀完一冊中國歷史。從封建時代到民國時代，從游牧社會到工業社會。西北也是中國的宗教陳列館，真像陳列着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教和他們更真的生活。

因為構成西北的因素太複雜了，所以它給一般人的印象至少是不開的，甚至極端相反。范長任先生戰前到青海寧夏走過一趟，就對西北的野蠻荒涼如出。而政府對西北的報告，譬如「福出若干款，增產若干担」之類，又把它形容成中國的倉庫。看到康藏邊境某落族生宰活人的消息，大家會驚詫西北居然還有蠻荒民族。新疆政變的事件發生，又引起了多少人的過份恐懼，說新疆人要在蘇聯扶助之下實行共產。

其實西北的問題雖多，但不複雜。合起來看，是一片神秘分開來看，每種現象的背後都藏着它歷史和地理的因素。現在簡單出要治中、馬步芳、和馮國璋等，替所謂「神秘的西北角」根枝大業地用畫個輪廓。

第一是新疆問題。談到新疆，至少會使人聯想到許多問題。為什麼新疆是特殊化？為什麼盛世才下野後，新疆會全境暴動？為什麼伊犁方面到今天仍舊一轍不服中央？為什麼強治中的態度老是這麼軟弱？新疆問題究竟何時才能解決？

太遠的史實，不去追溯，暫從盛世才轉變態度，悄然下台說起。盛世才治新疆是用最毒辣的秘密警察制度把新疆人捆成一團。卅三年末盛世才離去朱紹良暫代主席，這道堅固的鐵鎗驟然中斷，被束縛已久的囚犯，一旦見到陽光，不會不伸伸伸腿，躍躍欲試。所以在情感上，他們要動是必然的。而事實上，新疆過去儘管是漢人統治的局面，但一定要說新疆各族像維吾爾、哈薩克等蓄心反對漢族的統治，則嫌勉強。

吳忠信在卅四年四月四日到新疆後，帶去一批人，他們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去的，像勝利後接收大員一樣一到立刻手脚不停的搜括，這一來的確激怒了新疆人。盛世才在新疆固然同樣搜括，但祇許他一人作壞事，手底下人不敢妄為。吳忠信本人年高德劭，是個好好先生，但他的部下卻一個個如狼似虎醜態映在新疆人眼裏，積在心上，終變成一團憤怒的烈火逐漸燃開。朱紹良將軍當時身為第八戰區長官，負着治安重責，但因抗戰末期兵力不夠分配，眼看局面將不可收拾，亦束手無策。到十一月七日，伊犁發生暴動，憤怒的火焰連接起來，除迪化外，新疆全境燃燒着一片烈火。中央看到局面真正危殆了，才派宋希濂到新疆去，整頓兵力，想點平亂事。直到那時為止，我們還不能說，新疆事變有多濃厚的國際背景。有的，

最多是感情的挑撥，要同族人站起來，推翻漢人的統治。卅五年春季，張治中將軍的專機飛過灼熱的火場降落迪化，當時迪化已聽到炮聲，戰事正在距迪化百里處進行着。張治中是聰明人，他看出局面不能拖下去，唯一的一條路是「談和」，於是和平談判不經如響，就在這個時候，蘇聯才伸手伊犁，一些首領舉動的領袖們被捧作英雄，掛滿了勳章，在街上巡視，接受人民的歡呼。狂潮過後，英雄們被擱置起來了，有着蘇聯國籍的阿哈買提江來到伊犁，宣佈「東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新疆事變從此變質。

停戰協定是在兩方面力量不均衡的局勢下簽定的，所以政府方面所受的屈辱和所作的讓步，自不難想像。但張治中將軍在失敗的空氣中還打了個勝仗，那就是伊犁方面同意取消東土耳其共和國和蘇聯，表面上仍屬中央政府，允許伊犁方面保持七團兵力。

從卅五年到今天，新疆政治局面從破產變成小康，這不能不說是停戰協定的賜予。因為有這兩年的功夫，新疆國軍的實力增多了兩個整編師，南疆的維吾爾族和烏孜別克族也漸漸冷靜下來了，願意接受中央的約束。實在新疆少數民族像一部份哈薩克人，是從蘇聯逃出來的，他們深知一個獨裁國家的厲害，絕不會在逃出虎口後重跳火坑。說他們衝動可以，說他們親蘇擁共，實在荒唐。

以事實找結論，不難看出新疆問題的癥結，不完全是少數民族問題，也不單是政治思想問題，最重要的還是非國字。蘇要政府像樣子，唱得出來，拿得出來，新疆絕不會有問題。假如政府自不爭氣，「懷柔」得再徹底，甚至由中央派個大員一步一拜，拜到新疆，新疆還是有問題。張治中將軍酷愛文化活動，他不惜花上近百萬的錢，把新疆歌舞團送到內地游覽京滬平津台港。但當歌舞團回蘭州後，有人問團中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張主任好不好？」說「好」。再問：「蔣主席好不好？」說「更好」。再問：「為什麼？」他回答道：「他倆都有錢。」

另外一點，怪政府負責人大近視了，祇看到政治上的新疆，沒看見經濟上的新疆。地理的形勢已注定了新疆的經濟命運不能獨立就得依蘇聯。一八七一年，俄人進兵伊犁，十年內從事經濟建設，到如今新疆人離心力比向心力大。因為新疆祇得得上地大物博。煤、鐵、石油、棉花、糖、佔全國產量的首二位，而每方里平均祇住半個人。從迪化到蘭州有二千多公里，硬把這件原料運到內地來生產，簡直不可能，但堆積在當地又都浪費了，所以經濟的出路祇有蘇聯。任何新疆人祇要是人，眼着中央不能幫助他們吃飯和穿衣，誰能不對中央失望，誰能不掉頭看蘇聯他們更近的蘇聯？

青海和寧夏，又是另一個問題了。這裏是一個充滿英雄色彩和宗教意識的國度。在種族上寧夏漢人佔百分之六十，回人佔百分之四十。青海漢人佔百分之六十，其次是漢人和回人。在地理上，這兩省都是窮困不堪的地方，青海祇有湟水流域較富，寧夏祇有黃河兩岸才見農田。在歷史上，他們實沒有單獨的史蹟，祇是自民國十七八年把甘肅左右兩邊各割去一塊，改成行省後，才能自立門戶。青海寧夏兩地雖成省最晚，但現在看來省性却最強，原因就在英雄色彩和宗教意識。

青海本是蒙藏兩族的天下，雍正年間，藏人叛變，年羹堯率兵平亂，蒙藏人的勢力從此消沈。但民元後，宗族衝突仍依然繼續不絕，這時甘肅回人集中中地河州走出一位英雄，名馬麟。他率領子弟兵進入青海，跟叛亂的藏人打，也跟叛亂的回人打，殺出自己的地位來。所以青海改省後，首任主席孫運璿因和回人處得不好，激起叛亂，馬麟帶兵鎮壓，以戰功取得主席地位。馬麟退休先傳給他的兄弟馬麟，再傳給他的兒子馬步芳。從此青海省變成馬家天下。

馬步芳承繼着父親的英雄傳統和大同教的意識，坐上主席的寶座後，到今天恰好十年。十年內，以一個教掩蓋了許多教，以一個族掩蓋了許多族，以一個思想掩蓋了許多思想。所以，青海雖有三個以上的宗族却沒有宗族問題，雖然人權的大浪不斷往來衝擊青海却沒鬧過人權問題，雖然有人過得很窮，青海却沒鬧過要富問題。青海祇是個單純無聲

馬步芳承繼着父親的英雄傳統和大同教的意識，坐上主席的寶座後，到今天恰好十年。十年內，以一個教掩蓋了許多教，以一個族掩蓋了許多族，以一個思想掩蓋了許多思想。所以，青海雖有三個以上的宗族却沒有宗族問題，雖然人權的大浪不斷往來衝擊青海却沒鬧過人權問題，雖然有人過得很窮，青海却沒鬧過要富問題。青海祇是個單純無聲

馬步芳承繼着父親的英雄傳統和大同教的意識，坐上主席的寶座後，到今天恰好十年。十年內，以一個教掩蓋了許多教，以一個族掩蓋了許多族，以一個思想掩蓋了許多思想。所以，青海雖有三個以上的宗族却沒有宗族問題，雖然人權的大浪不斷往來衝擊青海却沒鬧過人權問題，雖然有人過得很窮，青海却沒鬧過要富問題。青海祇是個單純無聲

編者言

本刊是一個綜合性的刊物，但本刊着重思想和文化的討論，我們認為今日的局勢固然惡劣，一般國民對於現狀，也極感不滿，但一種不滿的情緒，並不能挽救現狀及進而挽救中國。不滿情緒確是改造現狀和改造中國所必需的前提，但如不把它建立於一定的思想認識基礎之上，有時反足招致更大的危機。今日中國最大的危機，毋寧是在思想上的大混亂。這種思想上的混亂，又造成民族精神墮落之傾向。今日中國既失去其與過去傳統的連繫，又無新精神之建立。這實即是中國全部文化的危機，使民族業已演化為種種惡果。當前的出版界和思想界自不應忽略此種現象，而應以改變此種現象為其主要的職責。我們這個小刊物，即是想對於這種新精神新傾向之檢討和培養，有所努力。我們不僅要從抽象方面來討論它，而且從每一個具體問題去說明它。除擬刊載少數近於純學術性的文字外，主要是想在各方面深入淺出地發揚這種新的傾向和新的精神。

這一期有兩篇關於中國文化的文章。一是陳定國教授的「中國文化的再生」一是林一新教授的「從近百年來的研究說到中國民族文化之未來」，因為性質相近所以合併刊出。這兩篇對中國過去文化的看法並不完全一樣。因為我們這裏的意見不求絕對的相同，我們需要討論。但這兩篇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即中國文化必須重新估計，同時文化之產生，必由於多方面的接觸和比較。這一共同的想法，即是一種新的傾向，其和時下那種公式主義的和排他主義的思想傾向，是截然相異的。我們在本期的「補白」上，特別引了哲學家開爾德 Edward Caird 在他所著的「黑格爾」一書上第一章中首段所說的話。開爾德生於一八三五年，死於一九〇八年，是美國倡導黑格爾學說的領袖，任職於格拉斯哥大學，影響甚大。我們引他的那一段話，係對於時代和時代思想之博大貫通觀點的一種精絕的解釋。他所說的那種「不為片面的肯定或片面的否定」，「不隨時代潮流之變遷而變遷」，及「深入於相反的潮流」，「從整個歷史著眼」等等。實代表極平偉大的精神，這也說就是我們所要追尋的新精神。

還有一篇李毓田先生的革新運動的起點，也依自己的說法指出當前民族思想的危機，並且也是由中國文化上面去著眼的。

但是，純粹文化思想的討論只是本刊內容的一部分，我們還要以大部分的篇幅，提供關於國內外各種實際問題的知識及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我們在這方面首先注意敘述每一問題的事實，儘量避免空論。但這個敘述不是簡單的敘述，而是分析性的敘述。或且也可以說是敘述性的分析。我們以為國內外各種問題之解決，不是徒靠激昂的叫聲所能濟事，而必須靠我們對於事實的認識。斯賓諾莎所說的「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就是我們對於國內外各種實際問題處理應有的態度。我們希望以「說理」或「認識」代替衝動，和時下各種浮燥的，帶火藥氣味的動手動腳的風氣。我們對於實際問題，要提出主張，但我們要把主張，變成為事實分析或認識的結果，不把它作為前提。只要是分析或認識的結果，不怕和人家的相同，也不怕和人家的相異。

本期吳鳳人教授的「捷克政變的真相」，就是一篇國際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了和普遍所提出的不同的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它不僅說明當前基本國際關係下的一個重要事變，一個國家的動態，而且暗示在這個變動之中有關於經濟制度的變化。例如希特勒時代的捷克是沒有資本家的。這篇文章又從過去演變至今的經過，來解釋捷克當前的情況，也是可貴的。我們希望以後分門別類地把國內外整個的和個別的問題，依照客觀每一變化有系統地逐一提到。

我們刊物上的正文，有「時論」和「專論」兩欄。本期「時論」有戴柱衡先生的「愛國者的試金石」一文，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除時論，專論外，我們尚有「介紹」，「書評」，「通訊」，等欄，以期和正文相配合。本刊籌備時間短促，第一期編輯方面也未滿滿意。唯希望大家多賜大作，藉使本刊增光，則本刊之進步可期。

的青海。

然而，馬步芳這人究竟是可愛的。他聰明，肯吸收。他手裏抓著青海，却沒有讓他停滯，他請求植樹提倡工業，使青海一片游牧地漸漸有了農地，有了工廠。而最可喜的是，他肯得透澈，他把青海作賭注押寶，押得非正不確。抗戰中青海曾出兩師兵轉戰豫鄂。勝利後，共軍攻勢猖獗，馬鴻賓的隊伍在臨東打敗仗，白部長打電報給他，要青海出一團人到臨東作戰，他出一師人，而且是最精銳的一師，師長馬繼業是他兒子。最近臨東大捷，中央賞國軍每人十萬，他自己獨

腰包每兵加發兩元銀洋。他還有個打算想在甘青邊境訓練廿萬子弟兵保衛家鄉。外蒙軍攻入白塔山青海又出一師人遠戍新疆。以時代潮流看馬步芳和青海，他們是落後的，但以西北的歷史看，馬步芳和青海都是進步的。以馬步芳看青海的遠景，僅能說不黑暗，但以馬繼業看青海，它的前途異常光明。馬繼業完全是個典型進步軍人，他年輕、英俊、不燥、不賭、不抽、不喝。甚至他怕人提到「馬家軍」三個字。他曾規勸父親改變私生活的另一面，爭重臉紅，最後，馬步芳在精神上屈服了。馬步芳認清

他的兒子是個有前途的人，所以近年來，以全力樹立他的威信，甚至犧牲自己的尊嚴，增高他的地位。這說明籠罩青海廿年的英雄色彩可能走上結東的道路，而狹窄的宗教意識也可能因政權的調手而走上正途。

就馬鴻逵個人講，他不得不把精銳的十八師留在中蒙。青海和寧夏還有許多相似處。第一是軍隊素質好，雖然武器不如人，中央也不肯把大量新式武器交給他們，但馬把國軍的素質實在整齊，個個身體好，戰志旺盛。第二是保甲組織健全。作為一個帶有封建色彩的統治者，對他們的子民不會太放鬆。所以青海寧夏的民間組織非常健全，有個外省人一腳踏入省境，幾次電話的工夫，全省各縣都可以得到消息。第三，祇有個人經濟沒有人民經濟。全省的經濟事業皆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不動槍桿

，單憑經濟力量也可以叫老如姓死或活。這種最嚴格的統治作風和中央政府實質一樣，祇是方法上的不同。張治中、馬步芳、和馬鴻逵三個人已充份代表了西北眼前三個最尖銳的問題。塔兒寺的阿加活佛和拉布楞寺的阿奔有大攝佐也是西北舞台上的一個角色，代表著神權時期的遺跡。但他們僅能自藝術觀點點綴西北的神秘。青海和南疆的蒙藏人民到現在還趕著大羣牛羊逐水草為居，而他們也僅保存著游牧社會的面目，是西北凍結了的一環，不能代表現代西北的經濟生活。（王文筆）

寶元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福建中路一二七弄八號
電話：九〇三一二 九五八一〇
批發部
河南南路四〇號
電話：八四五六〇

震亞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
歐美名藥 醫療器械 門市批發 價格克己
延聘藥師 精配處方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南京分店 南京太平路一四四號
重慶分店 重慶都郵路八十二號

上海證券交易所

地址：漢口路四二二號
電報掛號有線電二〇七六號
電話總線九八〇七〇轉接各室處

匯通商業銀行

上海分行

以國內匯兌為中心業務
以服務社會為至上主義

手續簡捷

匯費低廉

解款迅速

地址：九江路二九五號

電話：三七三三九
九八六五九
四三一三九

和成銀行

百萬元開戶 期限七天
星期存款

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總行業務部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四十號
電話四一〇二八 電報掛號一三八一
昆明分行 昆明南屏街三十五號
電話四三二九 電報掛號五二三四
成都分行 成都總府街八號
電話九九號 電報掛號一三八一
內江分行 內江文英街
電報掛號六三二
上海分行 上海(〇)廣東路一四二號
電話一四四五九 電報掛號二九二五
重慶民權路辦事處

同心銀行

創設於民國十六年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其他 商業 銀行 業務

總行業務部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四十號
電話四一〇二八 電報掛號一三八一
昆明分行 昆明南屏街三十五號
電話四三二九 電報掛號五二三四
成都分行 成都總府街八號
電話九九號 電報掛號一三八一
內江分行 內江文英街
電報掛號六三二
上海分行 上海(〇)廣東路一四二號
電話一四四五九 電報掛號二九二五
重慶民權路辦事處

川鹽銀行

著卓譽信·久悠史歷

商工助扶 業實展發
會社務服 融金節調

行分海上

號二四三路江九

話電

三六三七九 一〇九五九

八二〇七九 八六九二九

川康平民商業銀行

地址河南路甯波路口
電話：九八五九六號

南 漢 西 昆 成
京 口 津 安 明 慶 都
分 支 行 處
自 流 井 龍 坪 沙 小 南 江 實
雅 安 縣 高 瀘 敘 內 樂 江
雅 安 縣 高 瀘 敘 內 樂 江

一律不扣所得稅
本行由稅所不
代付本行稅所不
一律不扣所得稅

儲信部舉辦

外埠通信匯存請做票匯寄交敵部當日雙掛回奉

星期一期	利息二分	對本	每存一次	一百萬元
星期二期	利息一分六	利本	天百	二百萬元
星期三期	利息二分	得天	本利	二百萬元
星期四期	利息二分五	利本	天百	二百萬元

起萬十五●存可時隨
期轉利●取不期到

美豐商業銀行

(原名四川美豐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儲蓄信託事項

總管理處

重慶中正路一五〇號
電報掛號一八五九

上海分行

河南路五二二號 電話九七二二〇
電報掛號〇九三四

分支行處

遍設全國各大商埠

本行資本壹拾萬元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通惠實業銀行

依法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四川境內匯款特別優待

上海分行

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六一七

總行重慶

分支行處 上海 南京 漢口 成都 內江 自流井 瀘縣
(四川各縣均可通匯)